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杜鲁门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杜鲁门传

X X X 编著

目录

引子	002
第一章 在童年——往事如烟.....	005
第二章 走向总统——稳扎稳打.....	015
第三章 总统生涯——危难受命.....	030
第四章 结束“欧战”——小试牛刀.....	043
第五章 波茨坦会议——锋芒毕露.....	067
第六章 逼日投降——辉煌时代.....	089
第七章 “杜鲁门主义”——启动“冷战” ...	106
第八章 再次竞选——举步维艰.....	118
第九章 朝鲜战争——“君臣之争”	134
第十章 激流勇退——寻常百姓.....	149

引子

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有一座格外引人注目的小城——独立城。它坐落在该州西北角的地方，紧挨坎萨斯城，城内风景秀丽，古朴幽美。这里，诞生了美国最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以及普利策文化奖金奠基人、报纸发行大亨约瑟夫·普利策。

1972年12月26日，就在这座古城中，一位曾经叱咤美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悄然逝世，他就被埋葬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的院子里。每天清晨，他的房前都摆放着一些淡雅清香的小花儿，增添了几分古朴，寄托了几分哀思。

他，就是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sTruman)。

杜鲁门出身比较贫寒，他没有进入过正式的大学，完全靠自学而成才。他早年没有进入政界的宏伟抱负，但一旦转入其中，便几乎一帆风顺；从一个小小的县的法官到副总统，再由于天赐良机，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作总统，连选连任，最后激流勇退，安然地度过余生。

杜鲁门从1922年开始进入政坛，平步青云，

特别是在总统任职期间(1945年—1953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出风头。他刚一上任便促成了联合国的建立；在波茨坦“三巨头”会议上又与斯大林明争暗斗；他还命令向危在旦夕的日本投下了两个原子弹，逼迫日本屈膝投降。在二战结束前这段时期，杜鲁门的活动以领导美国打击德日为主，颇具英雄本色。然而，二战结束不久，他就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妄图支配世界；并对敢于和他对抗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下敌手，发动了朝鲜战争；在国际的一片谴责和国内一片混乱之中，他走下了总统宝座，重入平民世界。在杜鲁门的第二任期内，他反共的“冷战领袖”的形象闻名于世。本书就是以这两条展开的。

有人评论杜鲁门是为人正直谦逊、作事廉洁、说话直率，又有人认为他脾气暴躁、专横无礼、言辞辛辣。这些都是从杜鲁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个性上来评论的。在国际舞台上，一些国家把他看作推行和保卫西方“民主制度”的英雄；有些国家把他斥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代言人。这是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作出的不同评判。几种说法各执其理。

但是，有一点似乎没有争议，即：杜鲁门是美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在国内，他继承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原则，打破了传统的

美国外交中的“孤立主义”，使美国加入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国际上，他领导美国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热战”，又联合西欧，开启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可见，杜鲁门的确与其他总统稍有不同。

就声名来讲，杜鲁门远远落后于他的前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后任艾森豪威尔将军，甚至他的同时代的巴顿将军、马歇尔将军、麦克阿瑟将军都更加声名显赫。在那群星闪耀的年代里，杜鲁门的光辉显得平淡无奇了。

下面，我们展示的就是这位既“承前启后”又“平淡无奇”的总统的主要人生历程。

第一章 在童年——往事如烟

杜鲁门生于1884年5月8日，那是在一个叫拉玛的小镇上，满心喜悦的父母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起名为哈里·S·杜鲁门(HarryS Truman)。

杜鲁门的出身并不显贵，他的祖先世代以务农为生。杜鲁门是英格兰、爱尔兰和日耳曼人的后裔，而这几个民族恰恰是美洲大陆文明建立的基础。1606年，英国资产阶级已有很大发展，与封建国王的斗争日趋激烈。杜鲁门家族中的约瑟夫·杜鲁门为了逃避战祸，第一个来到北美大陆。他从英格兰诺丁汉郡最初来到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后几代人又移居到肯塔基州的谢尔比县。19世纪40年代，杜鲁门的祖父母一辈离开肯塔基州迁往密苏里州韦斯特波特兰丁(现堪萨斯城)，那里地处美国中南部，适合于经营大农场。当时，美国南北战争的前兆日趋明显，南北方就“黑奴制”之争已开始向分裂的边缘走去。杜鲁门家族受南方的民主党一派的影响很深，并保持了这种党派信仰传统。

哈里·杜鲁门的父亲叫约翰·安德森·杜鲁门(1851年—1914年)，主要从事农场主和家庭推

销商工作。

约翰·杜鲁门生于密苏里州杰克逊县，他身高只有约5英尺4英寸，因身材矮小而被大家称为“小不点”。但是他勇敢倔强，即使与“大个头”们争斗也毫不畏惧。他30岁时才结婚，在拉玛建立了自己的大牧场，以前他一直经营其父的农场。作为农场主和家畜商人，他取得了成功，但在1901年因从事农产品期货交易投机而遭受严重经济损失。他在堪萨斯城找到了一份充当守夜人的工作，接着，1904年在密苏里州克林顿附近再次从事农业经营，两年后，他举家移居到兰维尤附近的岳母的农场。

约翰·杜鲁门勇敢无畏的性格使他在事业上追求不懈，即使遭挫折也不气馁，这些精神都深深根植于哈里·杜鲁门幼小的心灵中。他后来曾说：“父亲不是一个空谈家，而是一个实干家。”

约翰·杜鲁门也是靠自学识字的。他经常教育儿子读书，甚至亲自朗读希腊古典作家蒲鲁塔克的《名人传》。这对哈里的爱好起了导向作用。

约翰·杜鲁门也参与了一些公共事务和党派活动。他晚年曾被任命为杰克逊县的公路管理员，并因此在一次检查公路的过程中受伤，不久便逝世了。他也是一名积极的民主党人，这与他的祖辈的政治倾向一致，因为民主党最初的根基在于南方的大种植园主和新兴

资产阶级。这种党派传统也传给了哈里·杜鲁门，他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党人而踏入政界。

每当哈里·杜鲁门回忆起自己的父亲，总是把自己被人称道的品质和作风归功于父亲。他评价道：“父亲的准则是诚实和正直，他的格言是宽宏……。”而他自己也正是努力这样作的。

杜鲁门总统的母亲是马撒·埃伦·扬·杜鲁门(1852—1947)。她出生在密苏里州现堪萨斯城市区范围内的一个农场中。她的家庭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曾坚决支持南部联邦，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她始终的愤恨，以至于后来在杜鲁门执政期间，她应邀到白宫作客，竟拒绝在林肯的床上休息，只因为林肯率领北方打败了南部联邦。

马撒·杜鲁门在结婚之前，曾在密苏里州列克星敦的浸礼会女子学院学习美术和音乐。因此，童年的哈里·杜鲁门一直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

马撒·杜鲁门一直关心着儿子的事业。在他作参议员的时候，她每天都真诚地阅读《国会记录》。她在杜鲁门担任未经选举而获得的总统职务期间去世，享年94岁。

哈里·杜鲁门的父母虽然都出身平民，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很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不懈的工作信念。家庭氛围也是和睦互爱的。

这给杜鲁门的童年生活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他的思想在爱和奋斗的熏陶下发展。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时，杜鲁门的回忆总是那么甜美。他说：“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在那样充满生机的家庭中成长，它教会我们乐观、积极，教会我们向既定目标坚持不懈地前进。”

哈里·杜鲁门的童年虽然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但是精神世界很充实。

杜鲁门小时候家境比较贫寒，而且由于父亲工作的需要而经常迁移。1885—1887年，他在哈里森维尔附近的农场生活，1887—1890年，他随家到了格兰德维尔尤附近的农场。在他6岁时，全家又搬到了密苏里州的独立城。他和弟弟、妹妹都在那里长大，成家立业，所以他一直把独立城视为他的故乡。在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幕过去之后，他重新回到这里，作为永远的居所。

成年后的杜鲁门身高5英尺10英寸，体重180磅左右；他特别注重仪表，人们眼中的他总是戴着金丝眼镜，西装革履。而与此相对照，童年的他体质羸弱，衣着朴素。而且，由于眼睛过早的有了毛病而整天戴着厚厚的眼镜，那时他才6岁。

由于怕他出危险，哈里的父母严禁他参与任何激烈的对抗性运动。那时，男孩子们和现在一样，喜爱棒球运动，小哈里当然也不例外。“为了不违返父母

去作运动员。这样，既和大家一起玩了棒球，又没惹妈妈生气。”在进行其他体育运动时，哈里也是谨小慎微。

像许多男孩子一样，小哈里也加入了当地街道的一个孩子团伙。他是独立城沃尔多街团伙的外围人员，也就是跟着打杂儿跑腿儿的，但是他从来不敢参与闹事。也许这正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相一致吧。“说实话，”他后来承认，“我有点像胆小鬼。如果有打架的危险，我总是赶紧溜掉。”于是，他渐渐疏远了这个团伙，因此也就避免了许多恶习的沾染。

小哈里是父母的乖孩子，很小就开始帮父母料理家务。他是家里的长子，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此他不但要到厨房去帮忙，还要照顾小妹妹。许多小哈里的玩伴回忆说：“他那时要给小妹妹梳头，给她唱歌，哄她睡觉什么的，我们都因此而嘲笑他。因为他根本不像是男孩子。”然而，哈里的行为得到了父母的赞赏，也给弟弟妹妹作了榜样。

清苦的生活带给哈里的并不是灰蒙蒙的童年，当他经过多年之后再回忆童年趣事的时候，在模糊的记忆中总会有几颗闪亮的火花迸出来。“我不知道我会怎么记得它们的。”

首先便是关于他的名字。他的全名是哈里·S·杜鲁门，而与众不同的是，字母“S”不是什么单词的

缩写,而只是一个字母。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的祖父叫德森·希佩·杜鲁门,外祖父叫所罗门·扬。他的父亲坚持要哈里取祖父中间的姓“希佩”,而他的母亲也要取其外祖父中间的姓“所罗门”。双方各不相让,坚持不下,最后的妥协方案就是中间的姓只取“S”,这个英文字母既是“所罗门”的开头字母又是“希佩”开头的字母。两方皆大欢喜。

而杜鲁门所记忆的最早的事,是他在哈里森维尔的家里的后院捉青蛙的事。那时他大约只有3岁。

童年的杜鲁门是在父母的严格控制下成长的,而且他也很乖巧。但尽管如此,他的生活仍不平静。一次给自己梳头的时候,他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差点把锁骨摔断。还有一次,在吃核桃的时候他又差一点让核桃噎死,幸亏母亲及时帮他吧核桃咽了下去。更有趣的是,他有一次关地窑的门,竟一不小心碰伤了自己的脚。他还曾剪断过自己的拇指尖,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剪掉的部分重新给他接上。如此的意外竟似有些传奇色彩了,而实际上,这也只能说明哈里尽管性格内向,不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惹是生非,但他仍具有孩子特有的淘气、顽皮的特点,说明他并未因家庭管教严格和自身体质弱而有畸形的发展。

真正使哈里和其家人心惊的是他9岁时得的一场

大病。那年，他患上了白喉，疾病使他暂时手足瘫痪，自己不能运动，只好坐在手扶车里让人推着。几个月之后，他的手脚才能运动，渐渐恢复功能。“这是上帝保佑我呢。”杜鲁门总是笑着这样说。

哈里童年的性格更倾向于内向，好静不好动，个性并不强。这也许就是他的童年时代在各种传记中总是记叙很少的缘故吧。他的童年正和普通孩子一样呢。

童年的杜鲁门也有儿童常有的向往和追求，随着年龄增加，他的意识也渐渐明晰。但他始终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他的生活是那么平淡，幼小的心灵中没有权力的野心，没有功利的诱惑，相反，他对艺术却情有独钟。受母亲的影响，他甚至一度把自己的终身事业定为钢琴演奏。这些都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爱好有紧密关系。

哈里·杜鲁门从5岁开始便在母亲的教育下读书。接着曾在独立城诺兰小学和哥伦比亚小学就读。1901年，他毕业于独立城中学。

在学校期间，杜鲁门非常好学，曾作为他的中学英语教师的蒂利·布朗回忆说：“他学习刻苦，不贪玩儿，但学习成绩并不特别出色。”由于体质弱的原因，杜鲁门在体育运动上也不突出，因此，在小学和中学时代，他像大多数普通学生一样，并未表现出什么卓越的才能和非凡之处。并且，在1901年初中

毕业时，由于父亲受伤失去工作，杜鲁门不能继续上大学，只好放弃学业去工作，以帮助母亲养家糊口。

然而，哈里·杜鲁门有一点爱好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特别喜爱读书。他14岁的时候已经遍览了独立城图书馆所有的书籍，这便是他高度近视的原因之一。他特别喜爱历史和人物传记。在1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查尔斯·弗朗西斯·霍恩的一套4册《伟大的男人和著名的女人》，引起了他对传记、历史以及领导和管理原则的兴趣。

杜鲁门读书不仅勤于阅读，而且善于思考。他读了许多伟人的传记，并对他们加以分析总结，形成自己的判断。他早年崇拜的英雄包括汉尼拔和罗伯特·E·李。沙皇亚历山大大帝和法国的拿破仑也引起过他的兴趣，但他对这两个人的征服事业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他们的战斗仅仅是为了征服而征服，而不是为了正义的原则。

杜鲁门所受教育并不多，学历不高，但他如何能应付总统这一至高权力呢？有的美国学者认为，正是他头脑中历史伟人的行为给他提供了范例。因此，这种早年的爱好为杜鲁门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尽管哈里·杜鲁门崇拜那些伟大的政治家们，但他的志向却并不在此。他曾一度希望报考西点军校或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却因糟糕的视力而没有成功。

于是，他又想成为一名钢琴家了。

“的确，”他回忆说，“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钢琴家。”而且，他的确在这方面努力了。他自小受母亲影响，就喜爱音乐。后来，他被介绍给堪萨斯城的E·C·怀特夫人学习钢琴，从独立城到堪萨斯城很近，哈里常常在路上想象自己成为钢琴家时的情景。1900年，他的憧憬更加强了。这年初夏，怀特夫人将他介绍给波兰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伊格纳西·帕岱莱夫斯基，那时这位作曲家正在堪萨斯城进行巡回演出。回忆起那次见面，杜鲁门总是很激动。帕岱莱夫斯基向他讲解了如何演奏这位作曲家的名曲《G小调小步舞曲》，并且鼓励他努力学习，从事音乐生涯。“那时我是那么高兴，仿佛那梦想的实现就在眼前。”然而，同样是因为他父亲受伤的缘故，他的音乐幻想也破灭了。但是，长期音乐学习训练出的艺术修养和品质，丰富了他的性格和思维。而且，音乐始终是他钟爱的东西，音符伴他一生。

哈里·杜鲁门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友。但哈里小的时候却上长老教会和主日学校。在18岁的时候，他才正式加入浸礼会。

哈里·S·杜鲁门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是以个人和家庭为中心完成的，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对其影响很小。在谈到他的这段经历时，我们

不会看到一个未来政治家的影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悄然成长。

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是那么平淡，像一股涓涓细流，然而，一场家庭的变故打断了这种恬静。青年的杜鲁门面临着艰苦的开端。

第二章 走向总统——稳扎稳打

1901年9月5日，连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利金在布法罗遇刺身亡，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于9月14日继任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26任总统。总统遇刺事件震动了全国，关心政局的人们都议论纷纷。而这时的哈里·S·杜鲁门却无暇顾及这些，他正面临着困难的抉择。

父亲的受伤及失业，造成了家庭经济的严重困难；报考西点军校的失败也使他个人心灰意冷。作为家庭中的长子，杜鲁门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17岁的他没有再申请任何大学，开始了艰难的求职生涯。

1901年到1902年，他在独立城一个铁路承包商那儿找到了一份计时员的工作，月薪35美元，这也是杜鲁门生平第一份工作，尽管是临时的。

1902年到1903年，他在附近堪萨斯城的《堪萨斯城明星报》担任邮件管理员，月薪42美元。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地方报纸，1917年后，卸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曾成为它的撰稿人。

19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垄断形成了。在金融资本高度集中的美国社会，行业发展起来。杜鲁门因此有机会在银行中工作了四年。

1903年到1904年，他在堪萨斯城国民商业银行作办事员，月薪35美元，后改为60美元。1904年至1906年初，他在联合国民银行作簿记员，每月挣75美元。就在这里，他曾与后来成为他的继任者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弟弟住在一个公寓里，但交往并不多。

杜鲁门在外的工作职位很低，工作量也很大，尽管劳累一些，但他却为能够帮助家里过活而感到自豪和满足。

1906年，早已康复的父亲又经营起自己的农场。于是，在父亲的要求下，杜鲁门结束了在外求职的生活，回到位于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附近的家庭农场。20世纪初，汽油发动的拖拉机开始在美国的田野上使用了，而且迅速地取代了曾作为主要动力的马和牛等。在这段美国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杜鲁门的农场生活比较安定。于是在经营农场的同时，他又开始自学一些法律、政治方面的知识，以弥补自己的知识缺陷。

1914年6月28日，欧洲巴尔干地区的战争阴云终于因“萨拉热窝事件”而激化为暴风雨式的战争。1914年8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呼吁美国人严守中立。到1917年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和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都没有取得决定胜利，而协约国士兵情绪尤为低落。

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在1917年初发生了转折，由于所谓“齐默曼电报”事件和德国开始“无限制潜水艇战”，美国的反德情绪高涨。1917年4月，威尔逊要求对德宣战，四日后，得到参众两院批准。

美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足，但美国新兵们却怀着高昂的士气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夏秋两季，越来越多的美国军舰抵达法国港口。在众多的到达法国的美国士兵中，人们可以找到戴着厚眼镜片的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在1905年至1911年间曾在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服役。1917年5月，他再次应征入伍，在俄荷拉马州锡尔堡的多尼芬营进行训练时，他主管第一二九炮兵团的小卖部。但不久以后作为正规军，他踏上了欧洲大陆。

到达法国的美军新兵大多对战斗一窍不通，步兵们一到法国便开始接受壕战和散兵战的严格训练，执行突袭任务。而杜鲁门作为炮兵军官，被送进法国炮兵学院学习。1918年4月，他走出校门时，已从

少尉提升为上尉。并担任一二九团D连的连长，这个连的大部分战士都来自堪萨斯城，与杜鲁门家乡很近，这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的初入政界便是在堪萨斯城由战友推荐成功的。

到1917年底，在法美军已达1715万多人，但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过战斗，而杜鲁门又不幸地成为其中一员。

1918年9月，杜鲁门所在D连第一次战斗，顶住了德国炮火对其位于孚日山脉黑伦见格山阵地的轰击，首次参战的杜鲁门表现出了坚定、勇敢和无畏的精神，使人心惶惶的连队稳定下来，阻止了开小差的人的逃跑。1918年9月，D连在圣米耶勒参加战斗。同年9月到11月，又参加了默兹—阿尔贡战役。1918年11月11日是一战的“停战日”，就在停战前的最后几分钟，杜鲁门还指挥部队对凡尔登东北的一个村庄发射了这次战争的最后几发炮弹。

1918年12月，杜鲁门第一次来到了巴黎。在3天的时间里，他参观了音乐和杂耍的联合剧场“女神游乐厅”。他对音乐的高雅在那里被庸俗化感到十分愤慨，声称那里的节目是“令人厌恶的演出”。

从1917年8月到1919年5月，杜鲁门一直在炮兵团服役，从中尉升到了少校，最后在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堡芬斯顿营以少校军衔退役，当时已35

岁。

在整个一战的过程中，杜鲁门既没有受伤，也没有获任何奖励。但他在军中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并从战争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后来把自己的成功的政治生涯归于战时服役和朋友们。

1919年6月28日，美国独立城的三一主教派教堂，刚刚退役的哈里·杜鲁门与相恋多年的伊丽沙白·“贝丝”·弗吉尼亚·华莱士终成眷属。这时，他35岁，而伊丽沙白是34岁。

杜鲁门与伊丽沙白的恋情是从小就开始的。伊丽沙白的父亲戴维·华莱士是一名地方官员，于1903年自杀身亡。而她本人则从小就长成了一个有男孩子气的女孩，打篮球、网球和棒球，参加铅球比赛，这些都引起了不能从事这些活动的杜鲁门的注意。他们是在主日学校认识的，当时他6岁，她5岁。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们便是同班同学，而杜鲁门一直保持着对她的爱慕之意。

1913年，两个年青人开始正式的约会，这时伊丽沙白早已在堪萨斯城念完巴斯托女子进修学校，回到了独立城。作为求爱者，杜鲁门表现得很羞怯，他们1917年订婚，两年后结婚。在芝加哥和底特律度过了短暂的蜜月之后，他们回到了独立城定居。

伊丽沙白·华莱士对丈夫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

持。当杜鲁门后来作参议员时，她受雇作为他的秘书。

当杜鲁门作上总统职位之后，伊丽沙白没有像她的前任那样在政府中起积极作用，并中止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首创的“第一夫人”记者招待会。她宁愿与来自密苏里州的老朋友们举办桥牌聚会，不愿像她后面的里根夫人、克林顿夫人那样惹人注目。1953年，她随退休的丈夫回到独立城，一直到1982年10月18日，因充血性心力衰竭而逝世，享年97岁，她是寿命最长的“第一夫人”。

不像西奥多·罗斯福、约翰·肯尼迪等总统，杜鲁门在婚姻问题是特别严肃认真的。他从未发生过婚外恋，很多总统因绯闻而大失人心，而杜鲁门则保持了良好的生活作风。他与伊丽莎白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

沉浸在结婚幸福生活中的杜鲁门马上遇到了另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如何营生。

早在1915年，他就在开采铅锌矿的事业中投机过，1916年，在石油勘探投资上损失了一些资金。杜鲁门并不认为自己没有商业头脑，于是他首先选择了最流行的从商之路。

他与战友埃迪·雅各布在堪萨斯城合伙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商店。雅各布曾是杜鲁门在多尼芬营经

营的小卖部的管理员。然而，这一次的合作并不顺利，商店最初生意兴隆，后来由于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加上杜鲁门不善经营管理和理财，商店最终关门大吉。为避免破产，杜鲁门从1922年起在12年中分期向债权人偿还了欠款，这次冒险损失了218万美元，而杜鲁门继续从商的信心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正当杜鲁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战友将他引荐给了托马斯·彭德格斯特。彭德格斯特(1872—1945)在1910到1939年间被公认为堪萨斯城和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党魁，在政界颇有影响。但他的声名却很坏，被人们称作堪萨斯城黑社会集团的头子。他依仗金钱和权势组织一个选举机构，操纵当地民主党的选举，能把他看中的任何人抬出来作官。只要民主党在该州执政，全州重要官员的任命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因此，他培植了不少州长、议员和地方官员。当杜鲁门有志于探索政界道路时，彭德格斯特扶植了他，这也给杜鲁门以后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彭德格斯特集团的支持下，杜鲁门在1922年底当选为密苏里州杰克逊县东区法官，相当于县行政官的职位。他在任期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努力消除浪费，减少县财政债务，修缮道路等，为当地市政建设作出了贡献，也赢得了市民的称赞。192

4年，杜鲁门再次竞选东区法官失败，一度成为堪萨斯城汽车俱乐部的推荐会员，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该城重要人物。

为了弥补知识的不足，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杜鲁门在1923年进入堪萨斯城法学院学习了两年。成绩优良。

1926年，杜鲁门竞选县首席法官成功，并在四年后连任。在这期间，他积极搞城市建设，为修建公路、一个县老年医院和新的县政府所在地而发行债券。在进行工程承包过程中，他坚持竞争性投标原则；即：碰到花费巨额公款包工时，实行公开招标，并把全部价目公布出来，交给要价最低的投标者。这种作法推翻了他的前任们把工程交给那些他们特别喜欢的人开工的作法，考虑到了人民和纳税者的利益，得到了市民的拥护。他还坚持现场检查，及时修改不当的建筑措施。在搞城建的同时，他精简机构，从县发薪簿上去掉无用的人，限制财政的乱开支行为。

杜鲁门一系列的政绩使他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在1929年，他已成为杰克逊县民主党人的领袖。同时，这段执政期间的磨炼，也为他以后从政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1929年10月29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暴跌，美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一下跌进低谷，资本主义

世界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开始了。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了斯穆特—霍利法案，猛提关税，从而加剧了美国与欧洲贸易对手尖锐的贸易壁垒战，也加速了世界贸易的急剧衰落。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年为1040亿美元，到1932年下降到580亿美元；1933年，美国社会失业率达25%，1000多家银行倒闭。

就在经济危机发生的第二年，即1930年，杜鲁门被任命为堪萨斯城规划协会主席和全国城市规划联合会会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全国性组织的职务，使他有对对国家规划有所了解。而他所了解的更加深了他对经济危机中的美国的忧虑。

1932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赫伯特·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此后连任四届。在他就任总统之后，迅速开始了“百日新政”，首先整顿银行业，以稳定国内金融体系，支持社会信心。其次整顿农业生产，调整农产品生产规模和速度，以求供求平衡。

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罗斯福命令劳工部在各地建立就业局，指导和帮助就业。杜鲁门在1933年被罗斯福总统联邦紧急救济署吸收，担任密苏里州只象征性领取菲薄薪金的就业局局长。当时提出任命的

佩金斯女士后来成为杜鲁门政府的劳工部部长。

就这样，从1922年到1934年初，杜鲁门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努力工作了12年，由于他的谨慎和认真，他在任内声誉日隆。

1934年初，杜鲁门计划竞选县税收主任一职，但彭德格斯特已将这一肥缺让给了别人，杜鲁门非常失望。当时彭德格斯特正好在物色参议员候选人，决定让杜鲁门试一试，那时他已经50岁了。在彭德格斯特集团的支持下，杜鲁门在1934年11月作为民主党人从密苏里州被选进参议院，由此，他正式跨进了美国国家权力核心机构的大门，开始了新的征途。

影响杜鲁门在参议院地位和声誉的，是他与彭德格斯特集团的关系。当时参议院中就有人揭发他们在地方选举中弄虚作假，把杜鲁门“送”进了参议院，并称杜鲁门为“彭德格斯特袖子里的参议员”。这些损害了他在参议院中的形象。

对和彭德格斯集团的关系，杜鲁门是直言不讳的：“在密苏里州，没有他们支持，根本无法参加竞选。

“尽管这个集团在政治上一直在提拔他，他却始终避免参与该集团的声名狼藉的活动，不去营私舞弊。

“彭德格斯特从未要求我做一件不光彩的事，”他后来回忆说，“他知道，即使我被要求去做，我也不会同意的。”在个人关系上，两个人还是不错的。在

彭德格斯特因向大公司索要巨款、逃税等罪名而锒铛入狱后，杜鲁门为报答他的提携之恩，照顾过他的子女。

在参议院中，许多人都瞧不起杜鲁门，于是他暗下决心，从头学起。他对分配的事不分大小，都认真去作。他每逢会议必然参加，并对所有的发言和文件都仔细倾听、阅读，在掌握不少情况的同时，锻炼了政治敏感性。他在会上的发言不多，但都经过仔细的琢磨，因而言之有物，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注意仪表举止，被人评为参议员中十个最讲究服饰的人之一。

杜鲁门在参议员中十分注意与人的交往。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党的党魁罗伯特·汉尼根。汉尼根后来担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民主党选举的许多重要事务。后来杜鲁门被提名副总统也是他的功劳。

正当杜鲁门第一任参议员年限将近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突袭波兰，揭开了二战的序幕。接着法西斯的铁蹄横扫北欧、南欧和西欧。美国在二战初仍保持了中立的态度。但1939年9月21日，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废除1937年“中立法案”的提案，并于11月4日得以通过，这就允许美国向交战国出售武器，美国实际上

站到了反对德国的一边。

1940年，美国国内就是否参战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就在这场辩论声中，杜鲁门再次当选参议员。虽然有人指责他是民主党中的应声虫、旧式政治上的投赞成票者，但更多的人则赞赏他刚正的天性、对于组织的忠诚和实干的作风。1941年1月，罗斯福总统提出了“租借法案”，向英法等受纳粹德国侵略的国家提供武器，杜鲁门在参议院投了赞成票。

1941年是个多事之秋。6月22日，德国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8月9日，美苏首脑“大西洋会晤”，决心共同反击纳粹，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卷入二战。时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完全赞同美国的参战。

为了作好战争保障工作，美国国内进入战时的政治经济状态。为了对付国防工业预算中的严重浪费，参议院成立了以杜鲁门为主席的国防计划调查委员会。杜鲁门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每周至少访晤总统一次，谈委员会的工作，可惜会晤没有记录。在和马歇尔将军、陆军部长史汀生等会晤时情况也如此。以这种方式，杜鲁门逐渐深入了解了这些卓越人物。

杜鲁门领导的委员会在反贪肃贪、打击浪费和营私舞弊方面作出了成就，受到人们普遍关注。194

1941年1月16日，罗斯福试图实行全面经济动员，创立战时生产局，由唐纳德·纳尔逊任局长，对国内经济战线进行领导。但纳尔逊继续听任军事部门掌握优先分配资源之权，结果他从来也没有确立起坚强的体制，让各大公司实际垄断了生产。杜鲁门的委员会调查了此事并公诸于众，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甚至一度对田纳西州和华盛顿一些巨大的军用建筑物进行调查，差一点揭穿了美国正在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在史汀生部长的劝说下，他才停止了调查。

1944年春，罗斯福准备第四次总统的竞选时，民主党内在副总统人选上发生了分歧。一派主张由副总统华莱士连任，另一派提出由国务卿贝尔纳斯担任，双方都不肯让步。罗斯福总统倾向于副总统为亨利·华莱士，但在民主党党魁们的压力下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华莱士。

这时，罗伯特·汉尼根提出了政治色彩不浓、没有明确派别倾向的哈里·杜鲁门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因为杜鲁门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一贯支持总统的决定和政策，并且在任国防计划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时工作成绩卓著，(在1941—1944年间披露了军事联合工业企业的高达150亿美元的浪费行为，)所以，杜鲁门的提名被作为妥协方案接受了。但杜鲁门本人却不愿接受这一职务，他一直犹豫不决，因为副

总统的职位形同虚设，只要总统在，它就没有实际权力。直到罗斯福宣布参加竞选的前一天晚上，杜鲁门还未决定。于是罗斯福打电话警告他，“如果他(杜鲁门)希望在战争期间分裂民主党，那就是他的责任，”于是，杜鲁门被迫接受了副总统的提名，并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1945年3月上任。

作为副总统的短暂的82天中，杜鲁门很少参加内阁会议，因为总统经常在国外，即使被邀请参加，也不会讨论什么重大问题，因为总统在会前或后会召集个别阁员进行讨论。因此，杜鲁门实际未参加多少国家政策的决策，甚至连研制原子弹的计划都不知道。他只是经常参加由总统召集的所谓“四巨头”会议，即副总统、众议院议长、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们谈论国家重要事务，但没有任何决策权。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副总统同时兼任参议院议长，在这个职位上，杜鲁门设法使参议院通过了对亨利·华莱士的商务部长的任命。

就在杜鲁门担任副总统的最后几天内，他的关键一票挽救了罗斯福的“租借法案”。租借法案于1941年1月通过，后经两次延长，1945年4月，它面临第三次延长问题。共和党在第三次延长时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有可能阻止总统利用该法案计划作为

善后救济(恢复和重建)的合同。该修正案表决时，出现了票数相同的情况：39票赞成，39票反对。于是作为参议长的杜鲁门有权投出关键一票，他投票反对该修正案，从而维护了租借法案。4月10日，租借法案的延长经过参议院批准。

杜鲁门不情愿地当上了副总统，正当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时，机遇又出现了，他被推向了个人权力的顶峰。这虽然是一个偶然，但他个人长期的政治积淀，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使他获得了拥有这个“偶然”的机会。他的总统生涯的帷幕就要拉开了。

第三章 总统生涯——危难受命

1945年4月12日晚8时整，白宫大厅中人头攒动，记者的闪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摄像机的镜头和人们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马上就要宣誓继任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的哈里·杜鲁门。

参加典礼的政府官员和杜鲁门的夫人及女儿等，都抑制着内心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典礼正式开始，而杜鲁门本人则面色平静，不时地向前来祝贺的人点头微笑。然而，他此刻的心情喜忧参半，却十分复杂。就在下午他和众议院议长在一起喝茶的时候，被紧急召回白宫。一下车，他发现罗斯福夫人神色黯然地在门口等候他，他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果然，罗斯福夫人哀伤地说：“哈里，总统刚刚去逝了！”杜鲁门一时愣住了，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尽管总统身体一直不好，但他的逝世仍给人以意外的打击。杜鲁门马上急切地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罗斯福夫人惊讶地说：“噢，现在你该帮助你自己了，你马上要作总统了！”杜鲁门这才从悲伤中找到一点清醒，喜悦、沉重和悲伤一时间充满了思想的小舟。

正当杜鲁门回味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时，典礼开始

了。杜鲁门上台，接受任命，宣誓，典礼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前来祝贺的人一一和他握手，杜鲁门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向众人道谢。

杜鲁门深知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他作为副总统，很少参与政策决定，因此对罗斯福的深层政治并不了解，这需要时间去研究。国际上二战的尾声已经接近，如何处理与各国的战后关系，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国内战时生产已快要结束了，如何完成从战时到和平时期的政策转变？受命于危难之时吉凶未卜！

记者和祝贺的人大都离去，杜鲁门夫人和他的女儿也和他吻别离去了，只剩下内阁人员等待着第一次内阁会议的召开，他望着这些将要帮助和辅佐他的人，心里默默地念到：上帝保佑美国，愿上帝也保佑我，阿门！

4月12日晚，杜鲁门就职典礼结束几分钟后，杜鲁门和他的阁员们就坐在总统办公室的圆桌子周围，开始了新总统的第一次内阁会议，除邮政部长瓦克因病缺席，其他人都安静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

总统秘书厄尔利首先发言，询问有关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是否按原计划在4月25日召开。杜鲁门毫未迟疑，“会议将按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按期举行！”这是他作为总统的第一个指示。

厄尔利走出去发布这个消息，杜鲁门开始第一次

内阁讲话。“我和大家一样热爱伟大的罗斯福总统。我的意图是继续罗斯福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所以，如果你们全部留任，完成罗斯福总统的遗愿，我将感到很高兴。”“我希望你们毫不犹豫地给我提建议我会对我做的全盘负责！”

第一次内阁会议时间不长，散会后，只有陆军部长史汀生留了下来。从这位部长这儿，杜鲁门第一次知道了美国正在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和进展情况，史汀生报告完毕就退了出去。杜鲁门后来回忆起这次内阁会议以及和史汀生的谈话时，非常感慨，他说：“我对自己说，我还有这多么的事情不知道呢，我该怎么办呢？”

在任职第一天，杜鲁门还同斯退丁纽斯、厄尔利等人讨论了旧金山会议问题。杜鲁门专心地听取了这些人的意见，决定立即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新总统对会议的支持。其间，有人要求杜鲁门举行一次白宫记者招待会，他深知自己对很多事情还没掌握，唯恐言多有失，便拒绝了在近期接待记者的建议。

在这一天，杜鲁门还第一次读到了“总统专用情报”，这是由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一手负责的，上面是各盟国和敌国的最新动向。杜鲁门第一次体味到了国际社会中的纷繁芜杂，虽然他曾经随同罗斯福总统参与过几次国际会议，但今日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他很

有名的一句话是这样描述当时心情的。“我就像躺在草垛上，天空中的星星、月亮一下子都向我身上压来。

第一天过后，杜鲁门工作更加繁忙，他只好以忙忙碌碌相对应。他的第一件重要使命，就是使美国顺利地加入联合国。

早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同意在二战结束后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因为1919年的国际联盟早已破产了。1944年7月，美国邀请中、苏、英三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以讨论美国提出的建议并拟定新的国际组织章程，会议分两部分举行，是筹建新国际组织的一次奠基会议。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确定了新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一些具体原则。会议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

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政策，决心支持联合国的建立。但他深知这不是件容易事。早在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提议建立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这与美国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相背，因此提案遭国会否决，于是，美国没能成为国际联盟中的一员。现在，又是美国在倡导一个国际组织，杜鲁门的命运如何？

早在他任参议员时，杜鲁门就曾带头和参议员鲍尔、伯顿、哈奇、希尔一道，力图使一项鼓励政府努力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提案获得通过。因此，他很早就受到了老“孤立主义”者的注意，作为总统，他也得继续和孤立主义者作斗争。

4月16日，杜鲁门向雅尔塔会议的记录人贝尔纳斯索要雅尔塔会议的记录，10天后，他得到记录原件，开始研究联合国问题。

4月17日，星期三。杜鲁门在上午第一次接见了出席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代表团由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任团长，团员有参议员康纳利和莞登堡，众议员布卢姆和伊顿，州长史塔生和吉耳德斯利夫博士，还有科德尔·赫尔。

“先生们，你们是罗斯福总统任命的一个卓越的有代表性的代表团的成员。”杜鲁门阐述了自己的要求，“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为了不引起像伍德罗·威尔逊所遭到的反对，先生们，我要求你们尽可能写出参议院能够通过的文件。”

代表们赞同总统的意见，并表示了尽力而为的决心。杜鲁门微笑着送他们离开总统办公室，想起昨天在国会的演说，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就在昨天下午1点，他走进众议院的议会厅，受到了经久不息的

掌声的欢迎。议员们、内阁成员和高级政府官员们都起立致敬，作为总统，杜鲁门将进行他的第一次国会演说，暨提交第一篇国情咨文。在激动的演说中，他保证实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尤其强调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问题，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掌声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4月17日上午10点30分钟，杜鲁门举行了第一次记者与广播招待会。他首先提出了记者招待会的规则，禁止记者们透露国家机密，禁止直接引用总统的话。

在回答有关旧金山会议的问题时，杜鲁门表示他不会出席联合国大会。他之所以不参加旧金山会议，是因为“我已派出了一个能胜任的代表团赴旧金山会谈，并代表美国的利益。我可以在办公桌上或者任何地方直接支持他们。”

4月19日和4月22日，杜鲁门分别会见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外长宋子文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有关联合国成立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一致，而苏联在许多问题上与美国有隙，特别是在波兰政府代表的问题上，早在克里米亚会议上，美国主张由波兰的海外流亡政府代表参加会议，而苏联主张由已成立的波兰人民民主政权派出代表。经妥协，双方决定由波兰国内政府和流

亡政府各派一定比例的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但为了反对美英等国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苏联决定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杜鲁门就此向莫洛托夫提出抗议，要求履行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波兰问题的协议。

4月25日，旧金山会议正式开幕。各国与会代表282人，中、美、苏、英、法五国的首席代表分别是宋子文、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艾登和皮杜尔。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盛会。

这天晚上8时，杜鲁门在白宫用无线电广播向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代表讲话。

“在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会议比你们今天在旧金山开幕的这次会议更为重要，更有必要。”“我代表美国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大会的成员们，你们是美好世界的建筑师。我们的未来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我们这里所说的问题的实质是成立一个明智的机构来解决国际争端……”

杜鲁门最后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美满得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永恒的尊严受到尊重。”“愿上帝指引我们走上他自己的正义的和平道路。”

旧金山会议并没有杜鲁门想象的那么顺利。各个大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发生

了分歧。首先是“大会主席”的产生，经过激烈辩论，决定由中、美、英、苏四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第二是会员国资格问题，苏联支持波兰，而美国却支持暗中帮德国的阿根廷，并强行表决通过；第三是联合国宪章问题，其中的安理会五大国：“否决权”制度、“大小国家”权利平等问题等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最后是“托管制度”问题，殖民大国态度暧昧。

杜鲁门始终关注着大会的进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盼望总有一天我们能建立起一个国际机构，终于能像在美国联邦同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他曾研究过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号召欧洲独立自主的国家建立一种联盟的“伟大计划”和前总统威尔逊的“和平计划”，希望能找到联合国建立后的运作方式。

正像杜鲁门接见美国代表团代表时所说，“要尽力保证参议院的同意”，因此，他和罗斯福一样，注意了代表团组成的成分，其中包括了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重要委员。他还同许多个别代表谈话，告诉他们自己的意见，力图使他们接受二战后成立新国际组织的想法。

就在旧金山会议激烈争斗的时候，杜鲁门远在华盛顿始终保持着对美国代表团的“遥控”。他命令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用电话或电报与他经常联络，通报大会情况，说明个别代表的意见，请求指示。同时，杜

鲁门也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康纳利和范登堡二人保持通信，从他们的意见和体验中获得教益。

在大会讨论各项内容期间，杜鲁门也紧急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对策。为了维持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他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措施。

在波兰问题上，杜鲁门坚决反对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政府的代表团，坚决要求波兰政府要由五大国帮助改组，这样他才能接受波兰代表团。5月1日，旧金山会议执委会全体通过了接纳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会员国的决议，这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强大起来，杜鲁门闻讯暗暗怀恨在心。

针对社会主义力量在联合国中的增加，杜鲁门——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急于寻找亲美的国家以扩充反共阵营。于是，南美洲的阿根廷被提出来。虽遭莫洛托夫极力反对，但在美国的操纵下，厄瓜多尔提出的接纳阿根廷参加会议的提案仍以29票对5票通过。其实，杜鲁门并不真正信任阿根廷，因为它的政府在二战中立场长期不明，直到1945年4月9日才向“轴心国集团”宣战。杜鲁门说：“我觉得阿根廷的举动很像杂耍的‘乐队车’一样，但我指令斯退丁纽斯在适当的时机支持接纳阿根廷，以促进西半球的团结。”

5月21日，杜鲁门接到美国代表团报告：由创

始国(即中、美、英、苏、法)提出的安全理事会的投票手续，遭到了几乎一切小国的攻击。攻击目标是雅尔塔协议中的“大国否决权”。

所谓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即：在联合国讨论的“重大问题”上，五大国只有在全体一致时，提案才能被通过，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对“重要问题”的一票否决权。

5月23日，斯退丁纽斯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同他讨论了会议急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杜鲁门坚持雅尔塔会议关于安理会投票问题上的决议，指示国务卿劝说各小国同意这种方式。他们还讨论了会议闭幕日期的问题。

到6月2日，又一个问题困扰着杜鲁门。关于安理会投票程序的争论似乎已陷入僵局。焦点在于，对一个争端的讨论和协商，是否可由理事会中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及用否决权而中止。俄国坚持可以使用否决权，其余四国反对。

斯退丁纽斯提议用已在莫斯科的哈里·霍普金斯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杜鲁门马上同意。6月6日，霍普金斯电告杜鲁门；斯大林已同意美国的意见。这样，僵局打破了。在“托管问题”上，各国争论不大。杜鲁门宣称他支持“民族自决”原则。他认为：“在和平确立以前，我们必须控制太平洋中的某

些岛屿，但这些地区对世界上别的国家不应关起门来。……在我任期内，我打算在我们负责的任何地区内尽力促成自治政府。”这些地区包括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等，美国借此在许多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基地。

另外，大会还通过了战后对战争罪犯的审判问题，以后的纽伦堡和东京审判都依此原则。

杜鲁门原指望在6月23日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闭幕式，但苏联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异议。在向《联合国宪章》提出的修正案中，有一条保证在联合国大会上各国言论自由和建议自由的条款，苏联代表要求删去，美国反对。于是，杜鲁门又直接与斯大林联系，斯大林建议双方都作妥协，于是条款经修改后通过。制定联合国宪章道路上的最后障碍物被清除了。

6月19日，杜鲁门离开华盛顿赴旧金山，在华盛顿州稍停后，于6月25日下午到达。当他从“圣牛”号飞机走下来时，当地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从汉密尔顿飞机场乘车进入城区，在人们的簇拥下，和美国代表团一同住进费尔芒特旅馆。当日晚上，杜鲁门举行宴会，招待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

1945年6月26日下午3时，《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旧金山退伍军人战争纪念馆举行。在大礼

堂的讲台上，参与联合国会议的各国国旗组成了一副色彩绚丽的长画卷，在这个仍充满战争硝烟的世界里，这一幅象征团结的画面令人感动。

杜鲁门跟随他的代表团走上讲台，他们就坐在一个圆桌旁，桌上摆着包括联合国组织五种官方文字写成的新宪章的书册。杜鲁门同在宪章上签字的各国代表们一一握手，表示对他们卓越成就的感谢。

历史性的一幕很快过去了，代表们又赶往歌剧院，在那儿将举行全体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当大会主席宣布请杜鲁门总统作演说时，代表们致以了热烈的掌声。

杜鲁门首先高度赞扬了这个《宪章》的意义，“在它上面我们可以建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把“宪章”比作美国的宪法，希望它们能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接着，杜鲁门赞扬了签字各国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个会议的成功，主要在于你们把思想坚定不移地放在主要的目标上”。同时，他号召与会各国继续努力，彻底击败法西斯帝国，他热切地希望各国团结起来，真正地按《宪章》行动，希望“列强”起领导作用。

最后，面对着台下的几千双眼睛，杜鲁门用深沉、略带沙哑的声音缓缓地说道：“让我们不错过时机，抓紧这个绝好的机会，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理智统治—

—在上帝的领导下创造持久的和平。”

在一片激动的掌声中，旧金山会议闭幕了。

六天后，杜鲁门向参议院提交《联合国宪章》并获批准，10月24日，《宪章》正式生效，这天被定为“联合国日”。

第四章 结束“欧战”——小试牛刀

当时间的老人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1945年4月的时候，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折磨得疲倦不堪的人们都已看到了战争结束的曙光，轴心国集团仅存的德、日已大难临头，而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则胜利在望。

杜鲁门继任后的工作除了完成旧金山会议以外，再就是与盟国共同协作，结束二战，制定战后对外政策，决定战争转向和平时的国内经济政策，他至此初显才能，“小试牛刀”。

杜鲁门十分关心战争进程，4月13日11点钟，他就同军事领袖作首次会见。在座的有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还有巴尼·杰尔斯空军中将、总统参谋长威廉·李海上将以及史汀生等人。杜鲁门首先表示了对他们卓越军事才能的尊敬，接着询问了战争情况。他们的报告简明中肯，说明了盟军顺利的进展情况和大致的军事布置。杜鲁门认为他作为全国武装力量的首长，亟需对部队说一些话，希望就此向盟国保证，美国会毫不退缩地继续努力。

会后，他专门与李海将军作了会谈。希望得到军事方面的支持。中午过后不久，他会见了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首领，包括众议院议长和参众两院各党的领袖。他希望安排一次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他将陈述继续履行罗斯福政策的决心。他强调，要求两党都继续支持把战争进行下去，也是重要的。与会的议员们大多赞同他的意见。

杜鲁门最后忧心忡忡地说：“我真正关心的，一方面是战争形势，另一方面是即将来临的和平问题。我们的胜利已迫在眉睫了，但是继胜利而来的形势究竟如何，则还不清楚。”战争形势似乎已十分明朗，但战后形势如何呢？

杜鲁门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与苏联的合作问题。在从1944年1月到1945年初这段时间内，苏联红军的足迹踏遍中欧：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芬兰等均被苏联解放。而且斯大林在许多国家内帮助成立了共产党为首的人民民主政府，这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沉重打击。杜鲁门对这种情况极为担心，恰好旧金山会议要讨论波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于是杜鲁门就导演了反对波兰支持阿根廷那一幕闹剧。

为了与俄国打交道，杜鲁门专门召见了俄国事务专家哈里·霍普金斯。杜鲁门从他那里获得了苏联一

贯的政策走向和对斯大林的初步印象——“一个坦率、粗鲁、固执的俄国民族主义者”。杜鲁门还热情地挽留霍普金斯，希望他不要在5月份退休。这时，李海将军带来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希望英美苏三国首脑发一个联合声明，因为盟军部队已迅速接近德国的首都柏林，胜利指日可待了。杜鲁门高兴地同意了这一行动。

英国是美国坚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盟友，为了对德国进行一次决定性打击，摧毁它残存的战争工业，杜鲁门曾建议，按照罗斯福的指示对德使用无人驾驶的旧轰炸机进行遥控轰炸，但丘吉尔有些犹豫，害怕英国受到德国的反报复。杜鲁门同参谋部重新检查了这个计划，最后复电：“我以为这个关于使用满载炸药的战时使用过度的飞机的计划，目前在欧洲可不予实行。”丘吉尔对此深感满意。

4月16日，作完第一次国会咨文的当天，杜鲁门一家从需要维修的白宫住处搬进了布莱尔大厦。战争的胜利似乎已不成问题，但国务卿在晚上递交的一份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份报告介绍了世界粮食的紧张情况，而且棉花、羊毛、煤也很匮乏。杜鲁门认为：“战争的结束会加深已经紧张的粮食情况。由于被解放国家内部的混乱，在旧金山达成的任何计划，即使不致失败，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考虑到这种

情况，他决定通知军事当局、检查并缩减他们的粮食和物资需求的计划，以便增加对这些地区的供应。

4月17日，杜鲁门签署了修正通过的“租借法案”，把这个法案第三次延长。这个法案在参议院讨论时，曾受到孤立主义者们的强烈攻击。但杜鲁门是这个法案的拥护者，他认为对于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的国家而言，租借法案所提供的条件对于它们的复兴是极其重要的。对于目前的国内工业能力，杜鲁门很有信心。他坚信一旦欧洲战争结束，甚至在美国开始缩减其总生产时，对太平洋的供应也是能够增加的。

同日，就在杜鲁门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的几个钟头。他头一次踏进绝密的白宫地图室。这个地图室是他从罗斯福总统那儿继承下来的，它位于白宫的底层，正对门厅电梯的对面。地图室里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和比例尺很大的欧洲和亚洲地图。这里每天都汇集着最新的战争情报，因此地图上标明了世界上一切主要军事力量分布的位置和每天最新的战线情况。

这天晚上，杜鲁门向盟国在全世界的武装部队发表演说。他引用林肯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上帝要我们寻求正义，在正义事业中，我们要坚定，让我们为完成我们肩负的责任而努力奋斗！”

4月18日早晨，杜鲁门会见了以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为首的共和党领导人，谈了关于对

战争所采取的态度问题。接着，他又接见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史密斯提出预算牵涉到国家的最高政策问题，因此总统应该适当地行使权力，杜鲁门表示接受。由于看到欧洲胜利日的日益临近，杜鲁门和史密斯讨论了1946年预算上的一些变动，杜鲁门要求预算局准备好变动了的预算表册，以便及早送交国会预算委员会审查，并建议史密斯与军方进行一下讨论。

第二天上午，杜鲁门召集副总统麦克拉、参院多数党领袖巴克莱、议长萨姆·雷朋和众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进行新的“四巨头”会议。杜鲁门向他们提供了战争和外交战线方面的最新消息并概述了欧洲战争临近结束、有必要修改联邦预算法案的问题。然后，11点半时，杜鲁门与马歇尔将军检查了欧洲战线迅速进展的情况。他们讨论了一件拟在英、美、苏三国军队在德会师后发表的文告草稿，并将文稿拍给丘吉尔。

4月20日早晨，财政部长摩根索向杜鲁门报告了关于战争费用开支以及财政部目前工作的情况。摩根索谈到，本财政年度的预算收入还不到预算支出的一半；并且国内的漏税行为、黑市活动猖獗。杜鲁门深知美国财源非常窘迫，这不仅是直接的战费，也由于其他国家正大量地向美国求援，但他本人也自觉无

可奈何。

同一天，杜鲁门任命查理斯·罗斯为新的新闻和广播秘书。查理斯在1901年在独立城高级中学毕业时是杜鲁门的同学，后来在《圣路易信使报》工作。当他们把任命的消息告诉他们从前在独立城的老师提尼·布朗女士时，她显得格外高兴，大声说道：“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一时间，这段轶闻被传为佳话。

4月21日，杜鲁门在地图室中得到消息：德军在各个战线上的抵抗都在崩溃。来自瑞士的谣言说，希特勒已经离开柏林。杜鲁门望着地图上各路盟军的进军箭头都齐齐地指向柏林，不禁想到，毫无疑问，欧洲战事的结束已指日可待了，只剩下太平洋战场的日本人在顽抗了。4月22日晚上8点30分，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接见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讨论了波兰问题后，杜鲁门提出了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达成过协议，但苏联因为全力反攻德国而拖延下来。莫洛托夫称：不管在其他战场上发生了什么，只要能够做到，苏联一定会尽快地加入太平洋战争。杜鲁门对此表示赞赏。但整个会谈因双方意见分歧而显得索然无味。

4月24日，杜鲁门正在办公室阅读紧急情报，美国驻英大使魏南特紧急电告他，丘吉尔首相要与他

通过远洋电话进行交谈。德国盖世太保的头子亨利希·希姆莱已通过瑞典政府提出西线德军投降的建议。

杜鲁门马上命人叫来李海海军上将、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赫尔将军和帕克上校，希望他们注意自己和丘吉尔的对话。一会儿，电话接通了，这是杜鲁门同丘吉尔第一次在电话中谈话。双方互致问候后，丘吉尔提到了希姆莱的建议，杜鲁门问：“他要怎样投降呢：是指所有的挪威、丹麦、意大利和荷兰？”丘吉尔说只包括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并且希姆莱决心不向东线的苏联投降。杜鲁门马上回答：“我认为应该强迫他向三国的政府投降，苏联、你们和美国。零星的投降，我认为根本不应该加以考虑。”丘吉尔也同意，“除非德国无条件地向三大国投降，否则英王陛下下的政府也先不考虑。”接着，二人讨论了对俄的态度问题和瑞典在这次投降中的立场。他们一致同意马上将希姆莱建议和美英立场转告斯大林，并约定于6月1日举行两人的首次会谈。

杜鲁门和丘吉尔互道“晚安”后结束了长谈。杜鲁门马上给斯大林发报，首先说明希姆莱对英美的建议，接着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请他马上给予答复。

4月25日，美国和苏联的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的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杜鲁门与斯大林互相致电祝贺。

4月26日，杜鲁门同预算局长史密斯举行第二次会议。由于前线上的进展，有必要对国内外的政策和担负从速重新进行审查和重新估计。杜鲁门曾指示史密斯为各种战时机构，如：战时人力委员会、战时情报局、战时生产局、民防署和海运委员会等制定预算，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认为如果能缩小其中一些机构或大大精简甚至取消一些，都是可以的。战时增设的这些机构臃肿庞大，运转不灵，而且马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杜鲁门还提出了改组劳工部的问题，把分散于各个战时机构的关于人力的职权集中在劳工部，由劳工部长统一管理。接着，他对史密斯抱怨说住宅情况是一团糟。而且住宅问题将在和平计划中占重要地位。杜鲁门提醒史密斯注意：在计划和平的时候，不应当忽视一项重要事实，那就是，即使欧洲取得了胜利，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战争还没取得胜利。政府各部门和各战时机构中，过早地使士气涣散是很有害的。所以，在削减战时机构的预算时，必须考虑职员失业、机构效率降低等后果。杜鲁门建议逐步缩减预算，并事先与机构负责人商量。另外，像物价管制局、战时石油管理局等机关是不应有变动的。而“失业补偿金”和“老年补助金”是完全不同的，当战时生产转变为和平时生产时，这些款项要增加。杜鲁门一再强调要注意战后民生和经济的问题。他同

时对史密斯关于给红十字会拨款的计划给予否决，他相信：“如果我们给红十字会拨款，那我们就不得不对其他私人团体拨款，而且这类性质的拨款有可能缩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计划。”

最后，他们又谈到拟定的租借法案的拨款。史密斯建议款额比上年度稍少一些，因为国会中反租借法案的人越来越多，孤立主义集团开始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租借法案原来是要借给盟国以武器和必要的物资，以补充它们战时生产不足。然而，由于对物资包括什么东西有着广泛的解释，某些物资变成了民用品，或用于恢复工业的东西，因此这便成了批评者的目标之一。杜鲁门清楚地知道把租借法案的款项用于战后恢复工作将在参议院遭遇到许多困难。于是他建议，处理恢复问题的较好的办法是扩大进出口银行，以便得到资金进行恢复工作，并鼓励多多利用国际银行。他还提到了新成立的联合国的作用。

杜鲁门这次与预算局长的长时间会谈，确定了美国战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在与史密斯告别时，提醒他，与情报机关搞好关系，注意租借法案并强调进一步精确估计预算的重要性。

4月27日，在科尔内·霍季斯将军指挥下的英美军队和伊凡·科涅夫元帅领导的乌克兰红军在易北

河会师，期待中的三国会师终于实现了，德国被切成两段，盟军开始向柏林进军。

杜鲁门对事情进一步发展感到十分高兴，他与英苏首脑同时发表了早就准备好的声明。并马上会见了马歇尔、李海等军事将领。

4月29日，意大利的德军同意了盟军的条件，签订了投降协议书，美国基斯柯将军参加了签字仪式。投降条件规定在5月2日中午停止敌对行动，投降也包括德国所指挥的意大利法西斯师团。意大利的战争结束了，杜鲁门打电报向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该战区的美国最高司令官马克·克拉克将军祝贺。他同时警告还在垂死挣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免于毁灭。

5月1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杜鲁门接到报告，说希特勒是自杀身亡的，他感到很振奋。同时，盟军从4月27日开始的柏林之战已近尾声，苏军的红旗马上要插到德国总理府的楼顶上了。面对刚刚过去的作为总统的十来天，杜鲁门感觉似乎“已经活了几辈子了”。因为这几天里集中发生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他不断地经受着快速决断的工作压力。现在，希特勒完了，胜利也终于来到了。

从5月2日开始，各线德军纷纷向盟军投降。5月4日，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全部德军都向蒙

哥马利投降了，敌对行动于5月5日上午8时停止。

5月6日，艾森豪威尔向杜鲁门建议：宣布5月9日为胜利日，同时说明在这条战线上战斗已大部停止，敌对行动将于5月8——9日午夜后一分钟全部停止。杜鲁门与丘吉尔、斯大林协调后决定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公告将在5月8日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发表。

这样，杜鲁门任总统还不到四个星期，德国就投降了。5月8日，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杜鲁门向美国人民宣布，欧洲的战争结束了。“自由的旗帜已在全欧洲飘扬”。在声明的另一部分，他提醒日本人，盟军有能力把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斗力量投入太平洋战场上去。在随后的向全国发表的广播演说中，杜鲁门号召美国人坚持战时精神，“直到赢得最后胜利”。

在按时召开旧金山会议、促使联合国按期建立之后，杜鲁门又完成了他的第二项工作——结束了欧洲战事。

胜利的太阳照耀着欧洲大陆的时候，盟国首脑们开始关注另一个问题，即占领德国问题。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等首脑会议上，英、美、苏一致同意彻底击毁德国法西斯的基础，在战后军事占领德国，但当这一时刻真的到来时，在具体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出现了。

早在战争结束前，丘吉尔就通过电报与杜鲁门讨

论美英占领区问题，他把已解放地区分为“战术地区”和“战领区”，并充分准备坚持占领区。他强调要建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在东德和西德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其主要目的是尽量缩小苏联在占领区获得的利益。杜鲁门对此没有作出答复。

当盟军最后推进到德国境内时，杜鲁门才意识到需要和英国、苏联交换一下意见，重新确定1945年1月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上三国曾达成的协议。因为美军进入德境后，不可能使他们刚好在原来划定的界线上会师，并且已越过了界线，军队需要按新的占领计划重新布署。

杜鲁门同军事顾问们商量之后，给丘吉尔发报：“德国的抵抗即将停止，因此，美、英和苏联对它们的部队将来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地区问题有必要决定一种有秩序的步骤。”他进一步建议，为避免混乱，每一个司令官当他认为他已准备好去占领他应占领的地区的任何部分，而该地区仍为其他盟国的军队占领时，即应通知他本国的政府，说明他已准备占领该区，有关国家应征得其他两国同意，以便发出必要的指令，立即撤出该地区，由指定占领国的军队去占领。他最后说：“当然，我们有必要立即就我们占领奥地利的地区达成协议。”

4月底的时候，杜鲁门从一份前总统的备忘录中

看到了罗斯福总统为美国军队在进入德国后如何对待德国所发的训令，他还设立了一个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对外经济管理局组成的委员会，专门开展研究工作。杜鲁门要求此委员会的成员陆军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就整个问题作一个书面汇报，并与委员会进行研究。汇报指出：罗斯福想委派一位文官出任驻德高级专员，同意让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将在美军占领的德国地区的军政府长官，并兼任德国管制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至少在初期将不委派一位文官任专员。

麦克洛伊的报告指出，德国迫切需要粮食、燃料和运输工具。“欧洲中部正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总崩溃中，其波及范围之广除罗马帝国的崩溃外，在历史上是无与比拟的。”“在这种动荡与崩溃、残酷与混乱的气氛中，我们必须同苏联人搞出一套确实可行的关系。……需要总统的支持，从政府机构和民间抽调所需的有才能、有声望和有魄力的人。”

麦克洛伊还向杜鲁门汇报了他与法国流亡政府首脑戴高乐将军的会谈。杜鲁门基本上沿袭了罗斯福备忘录中美国军队占领德日的方针。

5月初，丘吉尔又给杜鲁门通电，就各国在德国的实际占领区问题提出异议。杜鲁门发现美国军队已越过了规定的军事分区线，但是他认为：“我看不出

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来怀疑我们所定的十分明确的协定，也看不出干涉成功的军事行动有什么好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严格地遵守我们的协定，并尽最大的努力使俄国人也执行这个协定。”他还趁机指出，现在在苏联占领区的军队是美国军队，并再次说明任何撤退到各个占领区的协定都要经三大国的同意。同日，他

电告斯大林，希望遵守已达成的协议，直到5月2日，斯大林才复电表示同意。

这时出现了美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维也纳政府上的争执，于是杜鲁门在5月9日给丘吉尔通电，同意召开三国首脑的共同会议。

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除了在弗伦斯堡的邓尼茨海军大将——他自称为德国的代理最高统治者——下边的一个集团外，德国没有其他任何政府，而这个所谓的“邓尼茨政府”也没有得到美、英苏的承认。他们这时关心的是如何“公平”、有效地分区占领德国，包括如何从中得到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时，在奥地利，苏联帮助建立了“临时政府”，美国、英国、法国以苏联没与他们商量为借口，提出抗议，杜鲁门重申美国对于维也纳分区占领的立场：“将大维也纳城划分为几个小的区域，从而使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便利的设备。在德国和奥地利，我们

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设立管理机构，并部署各盟国军队撤回到它们各自的区域。在奥地利，这个任务根本没完成。但是在德国，占领和统治的筹备工作已经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完成，只待苏联的同意，每个区域机构的细则就可以公布。”

5月11日丘吉尔致电杜鲁门，仍要求美军继续驻扎在他们所达到的最前线，虽然他对各国占领地区表示同意，但他认为在同苏联的关于波兰和其他问题未得到满意解决前，盟国不应从它们当前的位置撤退。杜鲁门回电表示“无能为力”。首先，美国应遵守与苏联的协议，其次，美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除送往急需支援的太平洋战场的军队外，其余士兵应当回家。5月22日，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批准了欧洲咨询委员会所起草的关于战败德国的正式宣言，四国的军事司令官将于柏林会见，在宣言上签字，并留在那里制订管制委员会机构的细则。

6月4日，丘吉尔再次劝告美国军队不应撤退到指定的占领区去，并预见东西方冲突的形势。但杜鲁门仍告知他，美国决定从6月21日起从苏占区撤退美国的军队，在电报中，杜鲁门解释了原因：“在盟国军队从俄国地区撤退以前，盟国管制委员会不能开始工作。”“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行动拖延到7月的会议，将极不利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6月14

日，丘吉尔答复，同意杜鲁门的作法，英国军队也将在6月21日撤离。实际的撤离从7月1日开始。

杜鲁门原指望建立包括三个强国和法国在内的德国联合政府，进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在柏林有一个中央政府，他也将这个计划考虑进了即将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然而，事与愿违，分区占领德国最后导致的是‘冷战’阵营的两个前锋——东德和西德的“兄弟之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成果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二战后的东欧，在苏联的影响下纷纷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在中国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向腐朽的蒋家王朝冲击。面临社会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膨胀，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杜鲁门总统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政策。同时，国内对“租借法案”的态度日趋强硬，纷纷要求废除，杜鲁门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波兰是介于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中欧大国，历史上曾被俄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进行了三次瓜分。在二战的揭幕战中，波兰被德国的“闪电战”所击垮；在苏联反攻过程中，波兰获得解放并成立了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府。鉴于波兰在中欧的重要战略地位，杜鲁门坚决反对波兰的新生政权，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时大动肝火，要求在波兰成立多方联合政府。他

多次致电斯大林，指责他在华沙问题上的“不公正”。在他任职初期，无论是在联合国问题上。还是在占领区问题上，波兰问题始终是他用来威胁苏联的一个借口。同样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南斯拉夫、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杜鲁门关注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

1945年4月27日，丘吉尔电告杜鲁门，要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解放军到达的里雅斯特和威尼萨——朱里亚地区之前抢占该地区。杜鲁门回电说：“我已同意授权亚历山大将军来完成我们在的里雅斯特和从前在意大利统治下的其他地区的任务，我了解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杜鲁门小心翼翼地同铁托联系，希望他不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的行列。他在4月30日的一份电报中说：“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希望避免把美国的部队用来和南斯拉夫人作战，或者被用来在巴尔干政治舞台上进行斗争。”但铁托没有听从美国的意旨，他率军进入伊松卓河整个东部地区，设立行政机构，阻止亚历山大的盟军建立政府，最后，斯洛文尼亚政府在的里雅斯特宣告成立。

5月11日，杜鲁门感到铁托的攻势过于凌厉，他占领的里雅斯特地区是中欧广大地区的一个重要咽喉，比其他领土问题影响更深远。于是他与丘吉尔紧急磋商，准备威胁南斯拉夫接受盟军战区司令官的指

挥。5月13日，他又与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施加影响，并保证除非首先受到攻击，否则美、英军队不会主动进攻铁托，然而苏联并未理睬。

南斯拉夫的军队继续按他们的占领计划推进，5月17日，亚历山大给艾森豪威尔去信，说明形势已恶化到必须使用武力的地步了。杜鲁门闻讯后立即调动一切可调动的部队，进行武力威胁，同时又要求斯大林给予支持。但是，这两个措施未取得任何效果，杜鲁门只好把它拖到即将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中去。

6月9日，铁托终于同意达成一项协议，把威尼萨—朱里亚划为两个军事占领区，由盟军和南斯拉夫军队分区占领。

当时的中国政府被把持在蒋介石手里，他不但对外代表着中国政府，而且还担任着中国战区的盟军司令。在抗战初期他就遵照美国的“指导”，“以空间换时间”，致使大片国土沦陷；在整个抗战进行期间，他也一味地依靠美英的外援。宋子文作为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几次访问美国，杜鲁门在接见他的时候也表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在4月19日的会谈中，他允诺帮助蒋介石平息通货膨胀，增运黄金。

杜鲁门对华态度的最初想法体现在1945年4月26日的一份备忘录中，首先，他利用中国作为与苏联、英国进行政治交往的筹码。他希望苏联可以在

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有特殊权利，而英国可以在香港和西藏上捞到好处，并促使中国在东亚地区不能“称霸”。第二，他希望在经济上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给予蒋介石政府以一切可行的经济、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并要求立即与中国进行谈判，订立一项广泛的、现代的通商条约。第三，在军事上全力支持蒋介石政，一方面力求加强中国进行战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一方面着手改组、训练和装备一部分随同国民党军队。这样，能组织强大的力量在驱逐日本人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能促进“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内战的可能性，以及与苏俄的复杂关系，杜鲁门决定暂不帮助蒋介石发展现代化、有效的军事组织。

1945年5月14日，杜鲁门再次会见宋子文，宋要求拨付允诺的两亿美元黄金，杜鲁门表示同意。但他私下认为中国所需的是进行紧急的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改革，用出卖黄金的办法消除通货膨胀已被证明是无效的。6月9日，杜鲁门会见宋子文时谈到了中国领土的问题，说明美国对中国领土并没有任何野心，但提醒他注意苏联的动机。宋子文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废除一切殖民地时代的旧制度，而杜鲁门则把话题转到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上，并安慰宋子文说，美国不会作损害中国利益的事。

宋子文十分感激美国的帮助，但他不知道，正是这种帮助使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杜鲁门的黄金没有支撑住蒋家王朝腐朽的上层建筑。

欧洲战事结束后的美国国内问题也日益复杂了。德国投降以前的10天中，杜鲁门不断地和各阁员和三军参谋长谈话，研究哪些部队和物资供应送往远东。同时保持足够多的占领欧洲的部队，以维持被打败的国土上的法律和秩序。也为了防止再有希特勒之流煽起疯狂的民族主义火焰。但国内的反战厌战情绪高涨起来，要求军队复员；同时，杜鲁门还面临着怎样有条不紊地把一个以军需为基础的经济转为民用经济，把在战争中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予以安置的重要任务。

因为美国远离欧亚战场，它的本土未遭受任何破坏，而且它在战争初期与各国的贸易使它大发战争财，所以当时美国的工业力量是十分雄厚的，但其中军需生产厂占相当大比重，民用生产企业数量较少。于是战后主要食品的供应越来越不足，糖的供应已经削减到原来分配定量的75%。而另一方面，往国外输出粮食的要求却越来越多，杜鲁门感到了20多年来的第一次产品匮乏，因为“所有剩余产品都消耗完了”。

1945年5月1日，杜鲁门召请物价管制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来白宫商讨定量分配问题。鲍尔斯

抱怨说国会的批评和有些地方对定量分配的抗拒已使得他难于继续工作，许多手下的官员已经辞职。杜鲁门分析认为，物价管制局的压力主要来自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效劳的院外人士；在争取胜利的时候，人民和国会都不会反对物价管制局。同日，杜鲁门发布了一个公告，高度评价了物价管制局的工作成绩，强调了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号召人民支持它的工作。“这不但是为了保持国内的经济平衡，而且也补充了我们盟国的极其枯竭的资源 and 供应品”。

然而，许多工人不能忍受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起来罢工。联合煤矿工人领袖约翰·路易斯领导了最大的一次罢工，他义正辞严地向政府提出了改善矿工福利等要求。杜鲁门对这次罢工极其恼火，因为这些矿区生产的煤对二战时物资的生产和国内消费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采取了强硬措施，责令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接收了所有生产作业已中断或有中断危险的煤矿，由政府经营私人企业，迫使原来工作的人继续工作。

5月3日，杜鲁门行使总统否决权，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关于延缓农业人服兵役的决议。他认为，在战争期间每一个公民都有为自己国家服兵役的义务。而实际上，1945年5月的时候，正是欧洲和拉美等刚从法西斯魔爪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正需要粮食援助

的时刻，而美国也正是他们最主要的援助国。

杜鲁门的另一个着眼点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他认为目前职权重复，推卸责任以及混乱和浪费盛行。应该改组政府行政部门，以增加工作效率。他计划建立一个职权划分完全明确的政府体系；即：把责任交给那些遴选派定的各个部门和首长，而总统的政策方针是他们办事的依据和限制。他提议建立福利部，主管不断扩大的公共福利事业。

但是，杜鲁门很快就在权力下放问题上得到了第一次不愉快的教训。

5月8日，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欧·克劳利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个关于“租借法案”的重要文件，是由罗斯福批准的，但没签字。其主要内容是授权对外经济管理局和国务院在德国投降时采取联合行动削减租借物资供应量。杜鲁门认为很好，不假思索地签了字，谁知一下招致了大麻烦。

克劳利按命令去做，下令禁止把一切物资运往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甚至要求某些船员中途开回美国港口卸货。英国遭受的打击最大，对欧洲胜利后美国援助的减少感到不安。它要求继续执行租借法案，理由是1944年9月14日魁北克会议上英美两国首脑已达成了战后美国援助英国的协议。于是，194

5年5月下旬，英国两次致电杜鲁门，要求遵守协议，恢复租借法案。苏联也感到十分愤慨，它认为这是针对它的行动，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谴责了美国的行为，并以南斯拉夫、波兰问题相威胁。同时，国内的反应也十分激烈。5月31日，他收到了5个国会议员的联合署名的一封信，指责他废除租借法案造成的影响。6月初，李海将军报告说国务院和陆军方面都希望给予欧洲租借法案的援助，特别是供法国驻扎在德国的军队使用。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杜鲁门只得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坚持苏联只有参加对日作战才能得到巨额援助，而那些没得到美国援助的，可以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帮助。

虽然杜鲁门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并不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他认为，为了应付欧洲战后的需要，美国必须推行一个各方面相互配合得很好的政策，而不是力图靠租借法案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在考虑一个欧洲复兴的计划，这与战时的租借法案完全是两回事，由此可见，后来的“杜鲁门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

杜鲁门对租借法案有着高度的评价：“它是天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伟大成绩。毫无疑问，租借法案高达420亿美元的花费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

命。通过租借法案装备起来的每一个俄国、英国、加拿大的士兵，当他们投入战斗时，会大大减少美国青年在争取胜利中所面临的危险。我们无法回收这笔款，但我们所拯救的许多人今天还活着，美国也活着。”

第五章 波茨坦会议——锋芒毕露

时势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苏联的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表演代表正义的“三巨头”。他们的联系十分频繁，但成为决定重大事件的“三巨头”会议更是闻名遐迩。德黑兰、雅尔塔都因此而著名。杜鲁门代替了罗斯福当了总统，但他却远没有“巨头”的声名。也许，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因为两个巨头的先后缺失有些缺乏光彩，不过，对于杜鲁门本人，这是他最好的学习机会：他第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见斯大林、丘吉尔，他将与英国苏联共同解决战后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杜鲁门刚刚当上总统，心里就开始盘算着与苏联、英国首脑的会晤。在欧洲战事的末尾阶段，他始终与两国首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有关问题紧急磋商。

1954年5月4日，杜鲁门召见霍普金斯，准备派他去苏联。5月19日，他电告斯大林将派霍普金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与他进行会谈。临行前，杜鲁门叮嘱他的特使转告斯大林，美国不会拒绝严格履行它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也希望苏联履行它的义务。第

二天晚上，他召见了约瑟夫·戴维斯，希望他去伦敦，并致电丘吉尔。5月23日，杜鲁门宣布了关于他的特使分别前往莫斯科和伦敦的消息。

从5月26日到29日，戴维斯大使在棋盘别墅和唐宁街10号同丘吉尔进行了私人会谈。丘吉尔迫切地想知道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的具体日期，并表明了他将代表的立场。26日，霍普金斯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到6月7日，他们会谈了好几次。第一个问题就是三国首脑会见的事。斯大林答复，他将在杜鲁门所愿意的任何时候进行会晤，并且说，柏林的郊区，做为这样一次会议的地点是适宜的。杜鲁门指示霍普金斯，可以在柏林地区会晤，7月15日是较为合适的日期。最后，三国首脑同意于7月15日在波茨坦郊区的巴培尔斯堡会晤。

杜鲁门准备波茨坦会议的行动很早就开始了。首先就是重新组阁，更换一些内阁成员，以保证出访期间国内政治经济机器正常运转。

在杜鲁门任职初期，曾希望内阁全体留任，因为他不想给别人一个错误的看法，即他想改变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和平的局势占主导地位，改组领导层的时机成熟了。一些罗斯福的旧臣因主人的离去而准备辞职，有的甚至早在那之前就想离开了。

杜鲁门接受的第一个辞呈是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的。他将于6月30日退休，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纳根接替他的职务。沃克在罗斯福时代就要求辞职，但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接替他，汉纳根作过一段税务兼地方行政长官，并且与杜鲁门关系很密切。另外三个变动是：弗朗西斯·比德耳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任命汤姆·克拉克接任，路易斯·施魏伦巴赫替佩金斯女士任劳工部长，克林顿·安德森接替克劳德·威卡德任农业部长。6月底和7月初，内阁发生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变动：任命詹姆斯·贝尔纳斯继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为国务卿，任命弗雷德·文森代替小亨利·摩根索任财政部长，斯退丁纽斯作了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而摩根索因为总统不允许他去波茨坦会议而辞职。

到7月中旬，曾在杜鲁门刚上任时任职的内阁成员中只有四人留了下来。他们是：商业部长华莱士，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海军部长詹姆士·福尔斯特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这次政府的改组，杜鲁门认为是顺利的、必要的。他认为内阁好比是总统任命的董事会，帮助他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内阁成员应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改组后的政府较好地体现了这种意愿，使杜鲁门的地位更巩固了。

杜鲁门在国内杜绝“后患”后，准备去波茨坦了。

这次短短的旅行可谓兴师动众。阁员、大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白宫官员、陆海空三军、财政部和便衣警察，所有这些人要分别作出安排，在会议期间，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把白宫移到了波茨坦。总统总是难以单独行动的，早有便衣警察看了所有路线、所有将坐的车辆和将进入的邸宅。

6月6日，杜鲁门离开白宫，坐汽车到联合车站，接着坐火车到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兹城，在那里，他要乘美国舰队的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前往欧洲。选择军舰作为交通工具，一是安全方面的原因，二是通讯的方便，在军舰上， he 可以和华盛顿保持不断的联系，以处理政府的事务，又可以和伦敦、莫斯科保持接触，随时协调立场。

出于明显的安全考虑，杜鲁门出发时没发表公开声明。7月7日早上近6点，包括总统、53名助手、顾问和新闻记者的代表团登上“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舰上官兵给予总统通常的海军侍从仪仗队和“夹道的管乐队”的欢迎。杜鲁门住在舰上的海军司令办公室，又叫“旗乡”。1小时后，舰驶出海港，同行的有“费拉德尔非亚号”重型巡洋舰，它将负责护送代表团到欧洲的往返使命。到达公海后，杜鲁门在甲板上观看了“奥古斯塔号”的放船演习。杜鲁门在巡洋舰上过得很舒适，这里有乐队、电影，还有一些体育设施。

每天他都同随行的重要成员讨论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的态度。杜鲁门认为他此行的目的是尽快地使俄国参加对日作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战后的关系问题，防止另一次世界性的浩劫。

在航行的第四天，随团记者首次公开发表消息报道，并以很快的速度传到华盛顿。新闻秘书罗斯试图在杜鲁门到达波茨坦之前封锁住他的消息，但他失败了。在当晚之前，关于杜鲁门之行的消息已从华盛顿泄漏，专栏作家用无线电广播出去了。于是，封锁在军舰上的白宫记者们发出的消息已没有必要了。

7月14日，杜鲁门的舰队进入了英吉利海峡，受到了英国皇家舰队的轻量级巡洋舰“伯明翰”号和六艘驱逐舰的迎接，他们沿英吉利南部海岸行驶，驶过了多维尔海峡之后靠岸行驶，以观赏著名的“白崖”的秀丽景色。进入北海后，英国舰队向自己的停泊地驶去。杜鲁门在船上提心吊胆地过了最后一晚，因为这时舰队正行驶在北海中由轴心国和盟军设下的布雷区。

7月15日上午10点，两艘美国巡洋舰驶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杜鲁门结束了9天的海上生活，航程3387海里。在众人的夹道欢迎中，杜鲁门又赶往机场，他检阅了一个由400名军人组成的卫队，然后登上“圣牛号”坐机，其他两架C—54型飞机

着总统的随员，一起飞往柏林。三个半小时后，到达多加机场，那里距巴培尔斯堡 10 英里。杜鲁门在机场受到史汀生、葛罗米柯等人的迎接，检阅完仪仗队后，他驱车赶往在巴培尔斯堡的寓所。

巴培尔斯堡坐落在柏林东南大约 12 英里，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沿着蜿蜒的特尔托运河和格里列梯湖有茂密的林区，此城是德国有名的避暑胜地，也是战前德国有名的电影城。杜鲁门等人住在凯泽大街二号，是一幢三层灰泥的邸宅，这座建筑物漆的是黄色，在湖的右侧，有三排树木和灌木林环绕着，形成一个十分美丽的花园，直抵湖畔。杜鲁门的重要随员也跟着下榻在这里，每天处理紧急事务，因此这里被称为“小白宫”。

7月16日早晨，丘吉尔前来拜访，这是双方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略谈了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的议程问题，对主要问题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时的丘吉尔并不轻松，就在7月5日，英国进行了普选，他能否继续作首相还前途未卜，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以首相身分出席首脑会议了。

7月17日，斯大林到达巴培尔斯堡。第二天，他到“小白宫”拜访杜鲁门，并应主人邀请共进午餐。杜鲁门感到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是愉快的，因为他很有幽默感，极有礼貌。

经过与英、苏首脑的短的接触，杜鲁门大致了解了各方的主要立场观点，为会议的举行做了进一步的准备。

当天下午，波茨坦会议的开幕式在波茨坦塞西林宫举行，塞西林宫曾是前皇太子威廉的行宫。这是一座二层楼四边带耳房的褐色石房子，战争期间德国人和苏联人都把它作过医院。这时，为三国首脑各准备了单独的一套房间，而每一个代表团都有一间休息室和一个办公室。会议室是一个大房间，房间一端的尽头是凉台，近房间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圆桌，环绕桌子有三国政府代表团各主要代表的椅子。

5点10分，波茨坦会议正式宣布开始。斯大林主持会议时提议杜鲁门总统为大会主席，丘吉尔表示同意，杜鲁门接受了这一提议并致谢。接着由杜鲁门主持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起草准备在日后会议上详细讨论的议事日程的项目。杜鲁门声明他已有了具体提案提交大会，第一个提案就是成立一个外长会议。他在说明原因时指出：“我们从上一次大战后的凡尔赛会议所吸取的经验是，如果事后没有准备，就不能使一个正式的和会成功。”他提议由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组成外长会议，因为这五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斯大林同意这个办法，但他不了解为何中国要参加外

长会议讨论欧洲和平问题。杜鲁门告诉他这个问题可由外长讨论后汇报上来。

杜鲁门的第二个提案是有关在初期阶段对德国的管制问题。他说明美国认为管制委员会应当立即开始执行职务，并指出了指导管制委员会的基本原则：摧毁德国现存的全部武装和一切可供军事生产的工业；取缔一切纳粹政党和纳粹机构，重建德国正常的法律和民众生活；审判一切战争罪犯；对德国经济实行管制。

第二提案被交于外长会议讨论后，杜鲁门马上宣读了一个声明，这才涉及到美苏矛盾的痛处。他首先提及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对履行宣言中的义务取得一致意见。首先，三同盟国政府应同意必须立即改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现政府；第二，改组这些政府，要使用一切必要的方法，使其包括一切重要民主人士的代表；第三，三国政府应考虑如何很好地协助这些临时政府举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

杜鲁门最后一个提案是盟国对意大利政策的修改，由于意大利已加入对日战争，这是允许意大利加入联合国的时机。他提出：“三国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的目的希望他早日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恢复，最后使意大利人民有选择他们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

“最后，他再次感谢被指定担任主席，他将对斯

大林和丘吉尔将提出的任何提案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够获得与罗斯福总统生前一样的友谊和善意。

在这次会议上，丘吉尔建议把简单问题直接交给外长会议讨论，并要求在议事日程中增加波兰问题。这显然是与杜鲁门事先商量好的。斯大林提出的问题比较多，一是德国商船和军舰的分配，二是赔偿问题，三是联合国宪章下俄国托管权问题，四是与轴心国的附庸国的关系，五是西班牙佛朗哥政权问题，六是丹吉尔问题，七是叙利亚与黎巴嫩问题，八是波兰问题，包括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与伦敦流亡政府的解散问题。

整个会议的气氛都很和谐，但就在休会前关于中国的问题打破了这种平静。斯大林反对中国参加波茨坦会议，他认为把中国带到会议上去是使事情复杂化，他怀疑，“使世界那一边的国家参加这个会议是否明智，而这个国家在击败欧洲的敌人时，是没有什么贡献的”。杜鲁门则认为因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并且在太平洋战场上是最重要的盟国，所以它应参加这次会议，并且会议讨论的战后和平问题也包括远东太平洋地区。丘吉尔见情况不妙，就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认为在开会期间，对日战争可能结束，那时中国可以参加世界和会。杜鲁门只好让步，不反对在对日战争结束前中国不参加会议。

最后，杜鲁门提议会议应早一个小时开始，以讨

论更多的事情，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于是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杜鲁门通过这次会议，认识到作为会议主席将面临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的许多问题。斯大林愿意为俄国争取黑海海峡，丘吉尔则要加强地中海的控制。他感到他正在对付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性格、态度和背景的人。丘吉尔善于雄辩，有流利的口才；斯大林讨厌冗长的演讲，他会很快地把争论化为权力的问题。至于美国，杜鲁门所要争取的是对全球的控制，要领导一个符合自己原则的国际政治秩序。

第一次会议散会后，美、英代表团被邀请到俄国代表团的“无忧宫”参加大型宴会。第二天，杜鲁门回访了丘吉尔和斯大林。下午4点，回到塞西林宫开第二次会议。

丘吉尔首先发言，提出了记者与会议的关系问题，他抱怨说，有许多报界代表聚集在这个保卫得很严密的正在举行会议的堡垒外面。斯大林也大声喊道：“谁放他们进来的？”杜鲁门认为无需由他们三个亲自接待记者，而是由各国的新闻官向记者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入场。盟军还在太平洋上作战，欧洲有许多棘手的问题正待解决，因此不能在报上公开发表有关会议进行的报道。

接着，三国首脑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美国对成立外长会议提案的新草案。它规定会议的成员为和敌人已签订投降条约的国家这为中国日后在对日战争结束后参加会议打开了通路。第二，关于“德国”的界定。斯大林认为：“德国是指战后已改变了的德国，奥地利不是德国的一部分。”而杜鲁门认为应指1937年的德国，斯大林马上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是否在内，杜鲁门回答他所谓的“德国”是以1937年存在的《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德国”作为根据。这样，在《慕尼黑协定》中划给德国的苏台德地区不在讨论内。斯大林同意了这种划定。第三，波兰问题。这是一个已经争论了很久的问题，问题出在苏联扶植的卢布林政府和英国支持的伦敦流亡政府身上，哪一个应该掌权，或怎样将两方协调到一起。杜鲁门重复了他那句老掉牙的话：“应该照雅尔塔协定所保证的那样去做。”实际上，这也就是站在了英国一边。因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杜鲁门只好又把皮球抛回给外长会议，让他们继续讨论波兰问题。

6点钟，第二次会议急匆匆地结束了。

波茨坦会议前面两次集会给人以和睦、乐观、协调的印象，三国首脑似乎十分融洽。然而，随着实质问题的提出，涉及到了各国实在的利益，谈判桌成了战场，唇枪舌剑，风云乍起。7月19日，第三次会

议。外长会议提出四项议程：(一)处理德国舰队问题。杜鲁门强调，应首先分清什么是赔偿、什么是战利品，商船应列入赔偿，此事最后应提交赔偿委员会。斯大林认为，军队在战争期间所得到的战争物资就是战利品，但商船属于战利品还是赔偿物，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丘吉尔建议尽量地毁灭德国的潜水艇，剩下的可以平分，至于其他军舰，如果在会议上能达成共同的协议，亦可平分。杜鲁门同意把德国的商船和舰队由三国平分，但希望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再执行，应该利用它们为对日作战的胜利和援助欧洲服务。至于最终的处理，他说：“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出售商船与军舰。”丘吉尔最后建议这个问题在会议结束时作决定。(二)西班牙问题。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是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得到政权的，并曾向丘吉尔建议联合反苏。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都不喜欢这个政权。但杜鲁门不愿意插手在西班牙发动另一次战争以推翻佛朗哥，他认为应由西班牙人自己解决问题。斯大林坚持要求三国与西班牙断交，丘吉尔不同意。讨论来，讨论去，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杜鲁门忙出来打圆场，建议搁置这个问题，转向别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三)南斯拉夫问题的讨论。这里，斯大林和丘吉尔又产生了争执，因为没有南斯拉夫代表到会，所以双方同意邀请一个

南代表团。但是请苏联支持的铁托政府还是英国扶植的苏巴塞奇政府？两个人又开始喋喋不休地争吵。杜鲁门对两个人都感到厌烦，他生气地说：“我是以一个美国代表的身分出席会议讨论世界大事的，我并不来这里设警察法庭，来审理一件解决了的事或终究将为联合国所解决的事。”“如果不接触到主要问题，我就要收拾行李回国了！”他建议延期讨论南斯拉夫问题，其他人也只好作罢了。（四）英国和美国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装备问题。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而丘吉尔和杜鲁门则指责苏联乘乱占有了他们的一些设备，并要求赔偿。最后，这个问题被扔给外长会议去处理。第三次会议结束了。

开完第三次会议的那个晚上，杜鲁门在“小白宫”举行了国宴，招待英、苏政府代表团，在席间，他还表演了钢琴独奏，是他所喜爱的巴德列夫斯基的C小调小步舞曲。当然，这次活动有助于促进来到柏林的各国领导人的友好气氛，但终究掩盖不住各国的巨大矛盾冲突。7月20日，杜鲁门到柏林美军管制区委员会的司令部，参加美国国旗正式悬挂的典礼仪式，他作了即席演说，希望战士们继续为维持和平而战。典礼结束后，他立即前往塞西林宫，参加艰苦的第四次会议。

会场上火药味儿很浓。首先讨论的是意大利问题，

杜鲁门坚持美国最初的提案，要求意大利承担一系列简单的义务，代替投降条件，使它在和约准备期间，可以不受占领的限制。斯大林马上表态：原则上不反对杜鲁门总统的建议，但要求德国的其他附庸国——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受到同样待遇。很明显，这些国家已在苏联独自控制下，它不希望西方再插手进来。杜鲁门不愿让苏联计划得逞，便解释说，意大利是第一个投降的，应优先考虑它。这时丘吉尔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他不愿意放弃意大利的投降条件，他害怕英国将失掉投降条件下的权利。实际上，英国最担心的是得不到在地中海的优先权，从而失去它的海上优势。丘吉尔刚刚喘了一口气，斯大林又义愤填膺地开始了他的讲演，讲述他对德国的附属国的态度。他作了本次会议最长的一次发言，杜鲁门听得头都发胀了。最后，杜鲁门只好表态说，通过各国政府的协商，会达成满意的协定的，赶快进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奥地利的维也纳进行分区占领的事。这时没什么争议，很快就结束了讨论。杜鲁门很高兴能马上回巴培尔斯堡了。

7月21日，第五次会议，烽烟再起。在波兰问题上，美苏又针锋相对。先是讨论简单的波兰国外资产问题，斯大林作出让步，波兰新政府将继承旧政府的资产和债务。接着，波兰西部边界问题。这个问题

很明显，苏联要把波兰作为自己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缓冲地区，而西方并不希望波兰被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杜鲁门老生常谈地说要遵守雅尔塔协议，而斯大林和丘吉尔则滔滔不绝地辩论着。杜鲁门十分不耐烦，只好打断他们，说：“波兰人应否占领德国的一部分土地的问题，不能在这里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会议明显地陷入了僵局，于是休会。

7月22日，三国首脑仍不厌其烦，在第六次会议的开始又讨论波兰这个“该死的问题”。斯大林在重申前面的观点后，解释说雅尔塔协议的真正涵义是必须采纳波兰政府的意见来解决西部边境问题。于是杜鲁门提出邀请波兰代表团到会，参加外长会议以寻求事件的解决。

然后，大家讨论托管制度。因为旧金山会议已有了原则性的规定，这里只讨论个别问题，如意大利殖民地和朝鲜。又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唱了主角，丘吉尔不想放弃已占领的意大利的殖民地，斯大林不放弃与土耳其的协议，以获得对黑海通道的优势。面对两个殖民大国，杜鲁门什么也没说，他需要回去深入研究应支持哪一方才能使美国得到最大的好处。

第二天，第七次会议。这天的议程涉及四个争议颇多的地区：土耳其、哥尼斯堡，叙利亚和黎巴嫩(当时为一个国家)、伊朗。在土耳其，中心矛盾是黑海海

峡问题。杜鲁门总统认为：过去200年内的一切战争都源于自黑海至波罗的海和自法国的东部边界至俄国的西部边界这一片区域内，而本次会议及将来的和平会议应设法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他宣称，作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方案，应把丹麦的基尔运河、把自北海至黑海的莱茵河——多瑙河水道，以及黑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都作为所有国家客运和货运通航的自由水道，只征收管理和保养这些水道所必需的费用。这实际上为美国在世界的海岸上畅行无阻提供了条件。苏、英原则上同意这一精神。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军队已实施了有效的占领，正在和法国协商，因为这儿曾是法国的殖民地，美苏没有什么意见。在伊朗，问题也不复杂。美军已占领了那里，苏军也有一部分在那儿。丘吉尔希望双方都撤出，杜鲁门和斯大林同意。

7月24日，杜鲁门在军事将领陪同下到了英国总部，检查对日战争下一阶段的军事部署。英美两国参谋长向他们提交了联席会议的最后报告，报告中目标是尽可能早地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一天下午，英、美、苏三国联合参谋部进行了唯一的一次会议，讨论远东战局。

下午，第八次首脑会议。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斯大林要求美、英承认苏联军队占领过的德国附庸国

家新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杜鲁门马上表示反对，并斥责这些政府为“苏联的傀儡”，他要求按照美国所说的“民主方式”来改组这些政府。丘吉尔马上帮助杜鲁门，指责苏联把在布加勒斯特的英国代表团隔离起来，不准他们自由调查。杜鲁门马上附和，美国的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有同等遭遇。斯大林立即严辞加以反驳。双方你来我往，可谓“棋逢对手”。杜鲁门看争吵永无止境，就忙把话题转到了黑海海峡上。斯大林不大愿意让各国在那儿拥有相同的权力，便拉出苏伊士运河与英国周旋。杜鲁门看问题又要陷入僵局，便停止了讨论。他很生气地宣布，这个会议必须在10天之内结束，而且必须准备好一个公报，因为美国国内还有好多事在等着他办。其他两人也有同感。在简单地谈了一下维也纳建议后，会议又休止了。

7月25日，温斯顿·丘吉尔必须离开波茨坦，回国参加大选，于是在早晨开了第九次会议。在塞西林宫的庭院中拍了几张照片后，开始正式会谈。又是波兰问题，这次谈的是波兰从占领区驱赶德国居民的问题，杜鲁门认为不应容忍这样的事，而斯大林表示理解。在谈了一点德国工业生产的事后，大家为丘吉尔送行，希望他还能回到会议上。于是，斯大林宣告休会，等英国代表团自英国回来后再开。

在英国代表离会后，杜鲁门开始兑现对中国的承诺。他来波茨坦时曾带着一份号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要与丘吉尔商谈，成为中、美、英三国首脑们的联合公告。丘吉尔接到草案后马上加以研究。斯大林当然不参加公告，因为苏联同日本仍保持着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但杜鲁门私下和他谈了这事，希望得到谅解。他又和丘吉尔联合致电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指示他从速取得蒋介石的赞同，要蒋介石应邀发布这项公告，并把中国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在丘吉尔回国之前，他转告杜鲁门，他对公告的措词表示赞同，并同意由杜鲁门自行处理发布这项文件。

电报在7月25日晚8点半到达重庆，赫尔利把它马上递交外长宋子文。电报译毕后，便由赫尔利专程赶到黄山，亲自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赞同这份公告，但要求将自己的签名提到丘吉尔前面，以显示他的声誉之高。

7月26日晚9时，杜鲁门从柏林发出了这项联合公告。公告敦促日本迅速无条件地投降。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波茨坦公告”的最后通牒。

7月26日，杜鲁门一早便乘飞机到法兰克福，慰问驻那里的美军士兵。这天，他收到了丘吉尔在伦敦发出的邀请电，请他在会后赴英访问。第二天，英国人仍没有回来。杜鲁门抓紧时间与助手会谈，制定

策略。

丘吉尔终于没有回到会议上来，他们的保守党在竞选中惨败给工党。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上台，7月28日，他随同新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来到了波茨坦。他们首先拜会了杜鲁门，互相沟通一下情况。

当晚10点，三国首脑开了第一次夜间会议。也是第十次会议。斯大林首先代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个有条件投降的建议书，杜鲁门不屑一顾，他同时对日本人不考虑“波茨坦公告”感到气愤。接下来的辩论是围绕意大利问题展开的，主要焦点是它对盟国的赔偿问题。同样，讨论得不可开交，又是不欢而散。

当杜鲁门回到住处时，国内传来好消息，参议院以89票对2票批准了联合国宪章。这是杜鲁门外交事业的一个胜利，表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一次失败。他立即给新闻界写声明，深深地感谢参议院，“它们行动实际上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

第二天，斯大林因病不能开会了，于是会议延期。这天，莫洛托夫外长拜访杜鲁门，表明美苏矛盾的两个焦点是波兰问题和德国赔偿问题，他相信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整个波茨坦会议就可以结束了。杜鲁门对这两个问题给予了答复：一，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建议书，“沿波罗的海以东一线，经过史温曼德到斯德

丁以西至奥得河，再从该区沿奥得河到尼斯河东段合流处，又沿尼斯河东段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德国领土，包括本次会议所获致的一部分东普鲁士地区和前但泽自由市地区，将统归波兰管辖，上述领土不应视为苏联在德占领区内的一部分。”二，俄国可获得德国赔偿总数的50%。

最后，莫洛托夫提出了对日作战的近因问题。他希望英美正式提出请求苏联参战的要求，并且在对日作战前，苏中要签订一项协议。杜鲁门对后一个建议感到很突然，在送走苏联人后，他急忙与英国人进行了会谈，商量对策。

杜鲁门认为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没有苏联人也可以。苏联在这时参战，是表明他们才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很清楚。他不想让俄国分享英美在亚洲长期艰苦作战的胜利果实，这对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地位也不利。但英国人和他的顾问们都希望苏联尽快参战，加速日本人的灭亡。杜鲁门最后作了让步，同意邀请苏联参战。

第十一次会议在7月31日进行，关于德国赔款、波兰边界的讨论还算顺利，也许大家都太厌倦了。

第十二次会议在8月1日下午召开，这是杜鲁门留在波茨坦的最后一天。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德国黄金和国外资产问题，德国战犯的名单，引起了一些小的

争论。在审查了会议的各个委员会所同意的各项问题之后，只剩下最后的公告和议定书留待最后一次会议解决了。最后一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在晚上10点40分举行。会议主要是敲定议定书和公告。议定书将是各国最后的妥协，因此在文字推敲上发生了冗长而无聊的辩论。杜鲁门又一次显示出烦躁，他对辩论不感兴趣。议定书最终得到了三国首脑的同意，而公告问题却又一次争议起来，直到凌晨，公告草案得到批准。杜鲁门建议这个拖沓的会议该结束了，于是，1945年8月2日凌晨3点钟，波茨坦会议正式闭幕。

几小时后，杜鲁门到达加多航空站，开始回国旅程。在归国途中，他在英国的朴利茅斯港登上“奥古斯塔号”军舰，并同英王乔治六世在英国“荣誉号”军舰上进行了会谈。他谢绝了延长在英国的访问的邀请，也拒绝了丹麦、挪威和法国的邀请，马不停蹄地奔回美国。

波茨坦会议，是解决欧洲战后秩序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杜鲁门作为总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表演。会上他与斯大林的争端，已暴露了美苏日后争霸世界的端倪。杜鲁门在这次会议上虽然大都扮演着中立者的角色，实际上他一直在争取对苏联的遏制，对欧洲的控制权。通过波茨坦这块小小的舞

台，杜鲁门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了。

第六章 逼日投降——辉煌时代

1945年7月间，日本作为唯一残存的法西斯帝国，仍然执迷不悟，死不投降。这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作战重点都已转向了它，中国战场、太平洋海上战场都开始大规模的反攻，日本节节败退，这时的问题只是日本何时投降的事了。也就在这关键时刻，杜鲁门作出了惊世之举。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从罗斯福总统时代就开始了，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一大批核能专家被美国人网罗起来，创造这个“核神话”。在杜鲁门继任后，他十分关心原子弹的研制进程，经常敦促陆军部长史汀生加紧工作。

美国原子弹的整个发展是从军事上的考虑出发的，它的设计是由著名的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建议的。在汇集英美两国知识的总政策下，原子弹的研究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着手进行，这是科学、工业、劳动和军事的联合力量的成就，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制造原子弹的任务被交给了以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为首的所谓“曼哈顿区”的工兵特种部队。因此这个计划也叫“曼哈顿工程”。

史汀生曾告诉刚上任的杜鲁门，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将在四个月内完成。在杜鲁门离开美国赴波茨坦时，在新墨西哥的阿拉默果尔多原子弹爆炸实验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在大西洋上航行中，杜鲁门焦急地等待着试验的消息，前途未卜，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肯定大规模原子弹爆炸的结果。

7月16日早晨，杜鲁门高兴地接到了史汀生的电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符合了科学家们最乐观的期待。第二天，史汀生乘飞机来到波茨坦，详细地汇报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全过程。杜鲁门认为，美国拥有无敌的轰炸力量，这种武器，不但能彻底扭转战局，而且能扭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显然，杜鲁门对原子弹的作用夸大其辞。在整个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严密地保守了这一秘密，他一天偶然对斯大林提到他们拥有了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武器，但斯大林佯装不在意，只是希望杜鲁门用它来好好地对付日本。

说到对付日本，美国三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已经在波茨坦会议前制定好了击败日本的详细计划。陆军的计划着重在1945年秋在日本的最南部——九州——作水陆两栖的登陆。但这就意味着，到1946年的深秋日本才会投降。同时，登陆计划也将使盟军损失惨重，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必须有

苏联军队的支援。

杜鲁门对这一计划不感兴趣，他心里已经开始考虑用原子弹去打击日本了。在原子弹试验真的成功之后，他马上与军事将领们讨论如果用它来攻击敌人，会在物质上和心理上产生什么后果。在波茨坦会议上，他也小心翼翼地与斯大林讨价还价，希望苏联早日出兵，这样即使不用原子弹，日本的投降也是指日可待了。然而，斯大林一直不愿屈从于美国人，这更坚定了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信心。

日本公开拒绝“波茨坦公告”后，杜鲁门恼羞成怒，决定立刻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人。他的专家委员会建议，投掷原子弹之前不必提出特别警告，目标应该选择能够表现原子弹强大破坏力的地方，必须用原子弹来“袭击”敌人。杜鲁门非常赞成专家们的意见，他宣称：“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使用它时要依照战争法则所确定的方式。原子弹应尽可能投到靠近极重要军事意义的军需生产中心。”

最后确定的可供选择的目标有四个：广岛、小仓、长崎和新。这些目标是按作为第一次攻击的顺序排出的，选择的顺序是依照这些城市的军事重要性的大小而定的，当然，轰炸时的气候因素也得考虑进去。为什么不选日本的首都——东京呢？杜鲁门的解释是，东京是日本文化和宗教圣地，它的毁灭也许会更加激

起日本人的复仇火焰，这与美国的计划相悖。

第一次利用原子弹武器袭击敌人军事目标的车轮开始转动了。杜鲁门亲自授权斯波茨将军指挥下的空军战略大队，可以按具体情况轰炸预定目标，并要求他在8月3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尽快投掷第一颗原子弹。斯波茨选择了第509混合大队的特殊B-29小队来担负轰炸任务，七架经改装的B-20型飞机，以及飞机驾驶员和全体机上人员，都整装待发。同时，舰艇和飞机都在赶运原子弹的材料，装配炸弹的专家正前往太平洋马利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将从这去创造美国的壮举，日本的悲剧。

8月6日，杜鲁门乘坐“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正往美国航行，传来了震动世界的历史性消息，陆军部急电：“大型炸弹于8月5日华盛顿时间下午7时15分投于广岛，初步报告指明轰炸完全成功。这次比前次试验更有成效。”杜鲁门相当激动，他对周围的人高喊：“这是历史上的最重大事件！”几分钟后，第二封电报汇报了详细的轰炸情况，一切顺利。杜鲁门告诉军官们，太平洋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在华盛顿发出关于原子弹的新闻公报之后，杜鲁门在船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首先，他对所有献身于原子弹研究事业的人表示感谢。接着，他重申：如果日本拒不接受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必将遭

受原子弹毁灭性的打击。最后，他强调必须保守原子弹生产的秘密，使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日本人还是没有投降，于是杜鲁门命令空军继续寻找时机轰炸日本。8月7日午后，杜鲁门乘船返回美国，晚11点回到了白宫。这时，斯大林正同蒋介石政府谈判，准备参加对日作战。苏联的要求是继承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权利，并且要参与分配日本在东北的“战利品”。参加谈判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感到苏联的条件太苛刻，难以接受。但杜鲁门闻讯后，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向苏联让步，以使它早日对日宣战，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出卖中国利益的要求。苏联原准备是拖延参战时间的，但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的开花似乎也把他们的美梦炸碎了，眼看美国人要抢夺胜利果实了，苏联也不甘落后。莫洛托夫于8月8日召见美国大使哈里曼，向他宣布，苏联将于8月9日对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杜鲁门在中午得到这一消息，立刻举行一次特别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他只宣布了这一消息，“俄国已向日本宣战。”

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降落到长崎的消息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颗原子弹原计划被投在小仓，但当飞机飞临该市上空时，正好阴云蔽天，飞机绕了三周仍找不到目标。而新 因为路途遥远而被排除了。最后，轮到了长崎。长崎的气候也不好，但云雾的消散

却给轰炸者一个机会，显然，轰炸又圆满成功。

日本帝国主义者终于动摇了。8月10日上午，杜鲁门收到无线电监听员的报告：日本政府今天向瑞士和瑞典政府发出转致美、英、中、苏的照会，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首脑的“波茨坦公告”。这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照会，但杜鲁门知道日本马上就要投降了。果然，中午的时候国务卿贝尔纳斯带来了从瑞士公使馆转来的日本政府的正式照会。杜鲁门于下午2点召开紧急会议，草拟了致日本照会答复的文件，并决定立刻将答复电告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征求三国首脑意见。电报中说明了日本被占领后天皇和日本政府的地位、日本政府最终形式的确定、盟军的占领等问题。8月11日，各国最终答复，基本同意电报内容，但英国和苏联提出了措词上的一些修改。当日，贝尔纳斯将正式答复转交给瑞士代办赫尔·格腊斯列，经伯尔尼转东京。

既然日本投降了，杜鲁门就面临着如何占领日本及其势力所及地区的问题。杜鲁门态度非常明确：“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不能分割管制或分区占领。”他的意图是排斥苏联染指日本，这样美国可以独占日本，而一旦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凭借它临近中国和苏联的天然位置，美国就在苏联的家门口安下了“炸弹”。杜鲁门的意图可谓“阴险”。

同时，杜鲁门向海军上将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发出命令：决不许因日本人就波茨坦公告公开发表的结束战争的建议，而放松对日本攻击的警惕，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盟军都没有停止战斗。他还命令陈纳德将军指挥战略空军航空队向日本人口集中地区散发传单，把和平谈判的情况通知这些地区的日本人民，以动摇民心。他的第三个举措是致电盟国，美国已选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驻日最高统帅。在同一封电报中，他还就日军在各战区的投降目标提出建议。接下来，就是等待日本投降的最后消息了。

8月15日早晨，瓦达曼司令官告知杜鲁门，伯尔尼收到了从东京打来的密码电报，杜鲁门以为那是期待的消息，结果空欢喜一场。但下午2点，又一封密码电报从东京传到伯尔尼，4点零5分杜鲁门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消息：日本天皇正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停止了。7点钟，杜鲁门在白宫接待了蜂涌而至的新闻记者。杜鲁门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正式文本，并命令盟国部队停止武装行动。

杜鲁门刚刚欢庆完对日战争的胜利，苏联的麻烦就开始了。1945年8月16日，斯大林致电杜鲁门，基本上不反对美国关于分区投降的建议，但日本的千岛群岛应归苏联所有，日本北海道北半部的日军

应向苏联军队投降。斯大林的意图也很明显，他看穿了杜鲁门独占日本的野心，他当然不能容忍美国把势力扩张到苏联的眼前，因此，把千岛群岛和北海道北部划在苏联势力下，可以作为战略缓冲地带。杜鲁门当仁不让，回电表示：千岛群岛可以归苏联，但美国必须在那里有建立空军基地的权利，至于北海道北部，美国已经将它列入向美军投降的地区。8月22日，斯大林回电，反驳了杜鲁门的建议。杜鲁门未予理睬。30日，斯大林作出了最后的让步，苏联可以不占领北海道北部，千岛群岛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可以建立它的空军基地。杜鲁门表示可以考虑，并指派麦克阿瑟具体研究实施。

美苏对于朝鲜半岛的占领没有争议，双方以实际控制线为准，进行了协商，最后规定北纬38度线以南由美军占领，以北由苏军占领。苏联同意，在朝鲜取得独立以前，应通过一个托管阶段。

杜鲁门在中国问题上又遇到了难题。首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武装迅速壮大，并要求参与接受日本投降，但蒋介石予以拒绝。杜鲁门当然站到了蒋介石一边。第二，在东北的受降问题。苏联人要求日军向他们投降，而蒋介石要日本人向中国军队投降，他求助于杜鲁门，杜鲁门却表示无能为力。最后，关于香港问题。杜鲁门事先与艾德礼进行了谈判，

应英国人的要求，他同意香港仍归英国所有。他命令麦克阿瑟将军部署香港向英国司令官投降的事宜。对此，国民党政府极为不满，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手中强夺去的殖民地，中国早就有收回它的计划，而杜鲁门却不顾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把香港拱手让给了英国。结果，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又拖延了52年。

刚一听到日本人准备投降的消息后，杜鲁门就开始考虑应当在什么地方举行受降仪式。最后他选择了正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原因是：这艘战舰是最新式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它是杜鲁门的故乡“密苏里”命名的，并且他参加过命名典礼。

作为基督教徒的杜鲁门没有忘记给了他们欢乐和胜利的“上帝”，他在一份宣告书中宣布8月19日为祈祷日，他在宣告书中高度评价了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意义，并赞扬了美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坚强毅力。号召人民继续为国内建设而努力。他希望在祈祷日中，人们为和平而向上帝祈祷，借以纪念那些为了今天的胜利而献身的人们。

8月18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政府关于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由美国来掌握对日本的实际控制权。同日，他电告麦克阿瑟，就参加受降仪式的代表问题作了指示。

1945年9月1日晚，杜鲁门从广播中收听了远在万里之遥的“密苏里号”战舰上进行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想起了过去的历史中独裁者和专制统治者给他们的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时的情景，历史上曾有过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和他的‘无敌舰队’，他的舰队被摧毁后，便开始了西班牙世界强国的沦落。然后是路易十四和布楞宁之战，拿破仑和滑铁卢之战……日本的投降，它标志着世界上第二个最残暴的独裁政府的可耻失败和垮台。”

在受降仪式结束后，杜鲁门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首先欢呼日本人的失败：“我们将不会忘记珍珠港”，他接着回顾了美国人民参战的历史。“我们怀念着民主的保卫者、世界和平与合作的缔造人我国已故的英勇领袖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赞扬美国民众的奉献精神 and 自由意志，同时说明面临的困难，“胜利带来欢乐，也总是带来负担和责任”。他号召人民起来克服困难，去建立一个“奠基于正义、公平交易和宽容基础上的和平世界”。他宣布9月2日为“战胜日本日”。最后，杜鲁门祈求上帝保佑“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的人民在今后的岁月中也将获得和平与繁荣”。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杜鲁门作为

“正义代表”的光辉形象也在国际舞台上达到了最高点。可以说，杜鲁门执政的辉煌时代是在这段时期内，而他接下来的行动则违反了他创造和平的诺言，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冷战”的恐怖，给世界造成了不安宁，和平的天使堕落了。

旧金山会议、德国投降、波茨坦会议、原子弹研究、日本投降——所有这一切事件，都发生在不过四个月（4月到8月）的时间内。领导作战和处理外交事务都一下子那么突然和急迫地压到了杜鲁门总统的身上，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处理国内问题。现在，战争结束了，国内问题——把战时经济转入和平经济轨道的迫切问题被提到意识日程上来。

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国情咨文，这是他总统任期中最重要的咨文之一。这个咨文包括有关国内立法事宜的21点，这个21点咨文标志着他“公平施政”政策的开始。

这个咨文是杜鲁门广泛征寻助手和专家们的意见后形成的。咨文体现了他自己所谓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原则，并成为指导他今后国内工作的纲领和目标。其主要内容是概括叙述已经制订的关于尽快重建和平时期的扩充了的工业、贸易和农业计划。杜鲁门许诺将遵照下列8个具体方针办事：（一）尽快复员不必要的武装部队；（二）尽快取消和处理战时的

各种合同；(三)修理战时工厂，以便能照合同进行和平时期的生产；(四)限制物价和房租，直到公平的竞争方式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和解除消费者过分负担时为止；(五)凡因增加工资而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地方，不得增加工资；(六)尽可能取消战时政府的一切管制；(七)保留必要的管制措施，以防止生产脱节、原料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现象，而有助于复员工作和扩大生产；(八)防止工资收入或购买力的迅速降低。杜鲁门强调，重点工作是充分就业问题。

杜鲁门将这份历届总统国情咨文中最长的一份咨文付印散发，使参、众议员和高级官员们理解面临的事务。在这个咨文散发的10星期内，他继续向国会提出几份咨文，给“公平施政”增加一些新的建议，如健康保险、预付医疗费制度、原子能的国有化，等等。

在杜鲁门的计划中，首先要做的一点是整顿政府机构，以适应已产生的新的需要和任务。他在9月6日咨文中指出迫切需要增加总统在管理行政机构方面的权力，12月20日他签署了这个法案。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杜鲁门已下令减少了许多战时机构，并增设了一些。在加强行政机构方面，他特别关心的是当时副总统的职位空缺问题。他认为必须修改有关总统职位继承的法律，以便使只有经过选举的政府官员，

才能在总统死亡或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时，继承总统的职位。他提出众议院的议长因其接近“民选”身份而可以继承副总统的职位。这个议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但杜鲁门使其重新审议，获得通过。

杜鲁门的第二个棘手问题就是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这里他遇到了一个长期困惑美国政府的难题，是多管还是少管？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制止生活费用和一般物价的上涨；但实际上，人们希望政府要尽量少行政干预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

10月30日，杜鲁门在一次广播演说中宣称，必须恢复美国的自由竞争制度，而代替政府管制的唯一办法是商业、工业、农业各界及美国公众的全心全意的合作。到了12月，解除物价管制的办法显然起不了作用。1946年1月杜鲁门公开承认自己政策的失败。但他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正在国会内外开展活动的有势力的集团”，“它们不断催促、游说和争辩，要取消物价管制，而不考虑它们的后果”。2月14日，他发布行政命令，批准在物价管制方面作一点调整。即在一定条件下可提高物价。2月25日，他命令恢复经济稳定局，责成它处理关于政府的工资和物价政策的行政事宜，切斯特·鲍尔斯任局长，而保罗·波特尔接替他任物价管制局局长。

当物价管制法终止日期日益临近的时候，杜鲁门发表声明，又一次呼吁尽早延长迫切需要的物价管制和物价稳定的法律，因为，没有这些法律经济就会陷入混乱。6月29日，杜鲁门否决了众议院6042号关于修正物价管制法的决议案，并将原来的法律再延长一年。他之所以反对这个议案，因为它所修正的许多条款都将提高主要日用品价格，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参议员塔夫脱提出的为制造商提高物价的条款，这个方案将为通货膨胀提供一个可靠的方式。他警告国会，不要加上掣肘性的修正条款。7月1日，他发布行政命令，规定物价管制局继续拥有某些职权。但是劳工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由于国会没有重新恢复物价管制法，在7月上半月，物价指数上升了25%。如从6月中算起，有的物价指数增加了35%。7月25日，无可奈何的杜鲁门只好签署了一份又重新修正过的物价管制法案，这个法案还是缺少必要的保证物价稳定的实际办法。

杜鲁门的国情咨文中一再保证要“充分就业”，即任何准备工作、能够工作和愿意工作的工人都有在和平时期获得适当工作的机会。这就需要政府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保证公用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贯性。在1945年11月底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乐观地估计，在绝大部分已停工的战时工厂的复员工作

完成后，总的就业人数已恢复到“战胜日本日”前的水平。1946年2月20日，杜鲁门签署就业法案，目的是维持充分就业。法案规定成立一个两院联合委员会，由七个参议员和七个众议员组成，负责研究总统提出的关于就业的建议，并向国会提出报告。同时，授权总统在总统办公室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帮助总统进行就业管理。

就业问题的严峻性随着二战士兵们的复员日益加剧了。

美国人痛恨战争，但他们的政府似乎喜欢战争，总是把美国人投进本不相关的战争中去。欧洲战争刚刚结束，要求军队复员的压力便日趋强大了。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说明数百万军队再存在已没有必要，复员势在必行。马歇尔建议，参加过欧洲战争和五洲战事的老兵们先行复员，而新兵们则继续服役，以满足占领日本的需求。陆军部计划在1946年7月1日以前复员550万人，海军部则以每月26万人的速度进行复员。

杜鲁门感到如此惊人速度的复员进程实在难以抵挡，他认为复员计划的速度已达到“危险”的程度。但国内要求“军队复员”的呼声有增无减，人民纷纷要求实行更快的复员。1946年1月8日，杜鲁门被迫公开说明，不能将复员工作进行的如此之快，因

为“美国的未来正如同在战争时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的”。4月17日，在白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请大家注意陆军复员人数已近700万的事实，他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惊人的复员”，是一种“解体”。

为了维持国防力量，杜鲁门提出包括三种成份的战后军事组织：（一）一支在数量上比较少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二）一支大大加强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国民警卫队和有组织的后备队；（三）一支包括受过训练的所有美国男性公民的普通后备队。

大量的复员不仅加重了就业的困难，也带来了“住房危机”。1946年1月，杜鲁门在对全国人民的讲话中说急需住房500万套。不久，他向国会提出了一个退伍军人紧急住房计划，并建议发动一个全国性的国内教会内进行的“租让房屋”运动。国会没有及时通过贷款建筑廉价房屋的华格纳——埃伦德——塔夫脱法案，美国出现了“房荒”，杜鲁门不得不在10月25日宣布紧急状态，批准木材自由输入美国。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了人民的极端不满，而杜鲁门政策的软弱无力加剧了国内形势的恶化，罢工行动此起彼伏。1945年秋，罢工在煤矿中蔓延开来，最后218万名矿工停止了工作。接着，石油工人、伐木工人、汽车公司工人和铁路工人都举行了罢工。

1945年下半年，罢工蔓延到各个部门的数十个较小的工业，有时异常猛烈。1946年春天，劳工中的两次大危机发展起来，它们对公众的影响，超过了以往历次纠纷。1946年5月23日，铁路工会对横贯美国的大多数铁路干线的30万工会会员发出了罢工的号召。同时，40万矿工离开烟煤矿场，美国再度面临紧急局势。这次烟煤工人罢工，矿井关闭了45天，损失了9000万吨煤。杜鲁门凭借政府的干涉平息了这几次罢工，迫使工人回去工作，对工人领袖予以审判。

战后的混乱席卷了美国，但时间的长河慢慢地卷走了那些纷乱，杜鲁门总统经过许多困难和艰苦的决定后，终于保住了国内的稳定。

第七章 “杜鲁门主义”——启动“冷战”

杜鲁门勉强维持了二战后的美国局势，政治经济在混乱中逐渐向正轨靠近。

1945年8月原子弹在日本的举世震惊的威力给杜鲁门添了不少荣耀，但他随即面临着这

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保持这种优势，不使核机密泄露，特别是对苏联严加防范。在日本

投降后不久，他就向国会递交了梅—约翰逊议案，目标是建立一种永久性的“曼哈顿区”，由军事部门控制。同时，参议院设立了原子能特别委员会，监督原子能的军事和民间的使用。

在国际上，苏联实际上已开始研究核武器，但美国当时并不知道。当时只有英国在分享美

国的核实验的成果，这早在罗斯福时代就已确定下来了。日本投降后，英国首相艾德礼多次致电杜鲁门，要求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最新机密。然而，为了保持美国在军事上的最大优势，杜鲁门不希望英国也拥有原子弹，于是他以“国内讨论核能计划意见不一”为理由，迟迟不向英国人表态。虽然英美有此一争，但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更大，为了阻止苏联或其他国家

平利用”。实际上，这就给美英控制各国的原子能发展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委员会在1946年1月获得通过，6月14日在纽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上苏联和波兰对美国人的控制提出了抗议，因为这样会妨碍苏联核武器的进程，但因为有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大会还是通过了给违反规定的国家以制裁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赢得美国民众的支持，杜鲁门在国内事务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

首先，他提出了“国民保健计划”。1945年11月的一份国情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一计划，其要点为：(一)医疗费用在强制保险费和国家总收入中支付。(二)因病、因伤的工资损失由政府补助。(三)扩大公共卫生和妇幼保健事业。(四)医药学校和医药研究工作由联邦政府予以补助。(五)医院、诊治所和医药机构由地方兴办。

这几点被包括在华格纳—墨莱—丁格尔议案中，它从根本上有助于增进国民的健康。但

是，法案遭到了参议院、美国医学协会等组织的强烈反对。在第79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上，该议案被扼杀了。杜鲁门在以后的几年中曾多次提出这一议案，但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1946年11月间，杜鲁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取消了对工资和物价的种种管制，这是二战后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乐观的估计的产物。他认为不应为管制而管制，现在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商品的囤积居奇，要先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总统与国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占优势，而作为民主党总统的杜鲁门便处处受掣肘。1947年初国会炮制了“第一次撤销管制条例”，这个条例有效地终止了一切紧急管制和各种战时权力。而从当时经济状况考虑，杜鲁门并不想取消一切管制，于是利用总统权力对几种必要的管制延长了三个月。最后，他向国会紧急呼吁，要求对管制的取消要采取稳健、系统的步骤。但国会特别会议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批准了一个无关痛痒的法案，杜鲁门批评它“犯了不顾后果的错误”。

在劳工法案问题上，杜鲁门也与国会意见大相径庭。他在一份国情咨文中提出了解决劳资纠纷的四点方案：(一)及早制定法案，防止诸如工会权限纠纷罢工、胁迫抵制以及劳资方为了现有合同的纠纷而采取不合理作法；(二)扩充劳工机构，以协助集体谈判；(三)扩大社会法案的计划，以减轻劳工生活无保障的痛苦；(四)任命一个实地调查劳资关系的临时联合委员会。事与愿违，国会搞出了一个限制工人罢工的极端法案，称“塔夫脱—哈莱特法案”。杜鲁门以

为这个法案会恶化劳资关系，就否决了这个议案。在当天晚上，他还发表广播讲话，说明自己为维护劳工利益的“良苦用心”。五天后，参议院以 2 / 3 多数驳回了杜鲁门的否决，这个劳资关系法案便正式成为国家的法律。

在杜鲁门任职期间，他为美国的军队建设和情报工作的系统化作出了进一步的规范。首先，他总结了历届美国政府的经验，提出改组军事机构，将陆军部、海军部合并为一个统一

的国防部。他的建议得到陆军的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的支持，但两位海军上将金和李海表示反对。海军部已制定了详细的战后发展计划，主张组织更有效的联合委员会来弥补那引进公认的不协调的严重缺点。

杜鲁门对海军和陆军的不协调感到十分不满，他紧急召见了两军的参谋长，他们的主要分歧主要在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管辖上。杜鲁门认为可以成立单独的空军部，而海军陆战队除原有任务外，应增加海上战斗任务。1947年1月，这一合并军事机构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詹姆斯·福莱特任第一位国防部长，他于1947年9月15日宣誓就职。

杜鲁门的第二个举措是改组情报机构。在194

6年以前，陆军部、海军部各有其情报组织，

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以及各部的情报处都各有活动，收集的情况非常混乱，甚至互相矛盾。杜鲁门认为有必要取消、合并一些情报机关，以提高效率和情报的准确性。

1946的1月，杜鲁门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于20日颁布了建立中央情报组的行政命令，并撤销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组在1947年改名为中央情报局，由总统、国务卿亲自过问其行动，每天第一个见杜鲁门的几乎总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为了在政府中设立一个永久性的上层机构以协助总统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决策，杜

鲁门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1947年该机构建立，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组成，负责讨论军事、外交以及资源问题的重大决定，中央情报局成为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为它提供各种精确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局长列席委员会会议。

杜鲁门首创的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权力与日俱增，现在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决策部门。

1946年开始，和平的光环还在闪闪发光，冲突和战争的阴云已开始慢慢凝聚了。杜鲁门

的视线从国内的纷杂转向国际舞台时，面临的又是腥风血雨。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蒋介石一边欢庆胜利，一边暗自准备发动内战，而毛泽东运筹帷幄，

一边追求和平，一边准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

杜鲁门对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他告诉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

但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

他授权马歇尔将军组织调停代表团去中国，调停所谓“国共争端”。但事实上，在国民党政府一再要求下，杜鲁门执行了支持内战的实际行动，他在给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命令他们帮助国民党政府运输军队到东北和华北的港口，包括对这些军队的后方勤务上的帮助。

1946年7月，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这时中国的情况使他不知所措，蒋介石要求在军事上自由行动，而他的代表马歇尔将军正在进行所谓“和平努力”。8月10日，杜鲁门致信蒋介石，劝他暂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等待中国“民主”进程的情况。然而，蒋介石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于1946年春发动了全面的内战，美国的调停宣告失败。杜鲁门深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对它能否胜利给予怀疑。尽管如此，他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因为苏联

已经是一个巨大威胁了。因此，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却提供了巨额援助，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

战后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而欧洲的敌人就是苏联，二战时的坚强盟友终于反目为仇了。

1946年初，苏联在伊朗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的注意。他电告苏联政府，要求遵守它与英。

美达成的撤军协议，在3月2日前撤离伊朗，苏联没有理睬他的警告，继续支持伊朗北部阿塞拜疆省的自治运动。3月6日，乔治·凯南代表杜鲁门再次向苏联提出抗议，后未奏效。

当时，杜鲁门最感到担心的是土耳其和希腊问题。苏联已经在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

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帮助建立了由共产党或工人党组成的政府，

这些国家连同苏联组成了对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阵营。杜鲁门对这些东欧国家已不抱任何希望，但他坚决反对苏联对土耳其和希腊的干涉，担心它们的“赤化”。

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主要是传统的黑海海峡问题。1946年7月，莫斯科给安卡拉一份关于调整达达尼尔海峡使用规定的照会，排斥一切非黑海沿岸国家的权利。杜鲁门支持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准备武装保卫国土。但是，按战后落后的武器装备

贫困的人民生活来讲，土耳其根本不可能对抗苏联。

另一个焦点是在希腊。当时英国占领着希腊，并组织了右翼政府。但贫困、饥饿使人民

忍无可忍。希腊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壮大，并得到了附近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英国政府仅靠4万名英国士兵和大量援助才保住了临时政府的存在。1945年秋，艾德礼紧急致电杜鲁门，希望美国给希腊援助。1947年2月，英国又一次告知杜鲁门，英国已无力支持希腊政府，不得不在3月30日停止一切供应，并于4月1日以前撤出希腊。英国人希望美国继承英国的权利。

杜鲁门紧急召集阁员们讨论当前局势，他一再重申：英国撤出希腊，那么共产党政府一定会建立起来，希腊势必站到苏联一边；这样，土耳其将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的一个无法防守的前哨；东欧的许多国家已经陷入共产主义的阵营，不应该再牺牲希腊和土耳其。

1947年3月12日下午，杜鲁门在众议院大厅发表了演说，他向国会联席会议的代表提出了后来的所谓“杜鲁门主义”。这是继丘吉尔“铁幕”演说后的又一次“冷战”宣言。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依靠武装暴力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奴役

阴谋的自由人民。”这里的“少数人”当然是指

正在领导国内革命的共产党人，而“外来压力”则指苏联的援助。这句话说明了美国要称霸世界的野心。他表明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行为都会得到美国的干预，如果他认为那是威胁和平的。

“我认为，我们主要应该是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援助，因为这对经济稳定和有序的政治

进展是必要的。”杜鲁门指责“共产主义”为“极权专制”，并宣称：“倘若我们的领导表现出举棋不定，我们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受到危害——我们也必定使我国的幸福受到危害。”

“杜鲁门主义”是一种针对苏联而提出的强权理论，它标志着美国从“孤立主义”到干涉世界事务的巨大转变，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标志。

这次讲话后，美国国会在5月通过了大规模援助希腊的决定。海军部根据总统命令，派遣航空母舰“利特号”和其他9只军舰“访问”希腊，实际上是威慑苏联，帮助镇压国内起义。然而，共产党领导的希腊游击队在7月份还是占领了大片土地，于是美国决定增加援助。

“杜鲁门主义”提出后，美国政府便着手实施，其中最著名的是“马歇尔计划”。

1947年4月，新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从莫斯科外长会议归来，非常失望地向杜鲁门报

告了东西方分裂的巨大悲剧。马歇尔向杜鲁门提出了欧洲经济统一的重要性。如果能引导欧洲国家把经济问题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互不关联的问题，来寻求自力更生的办法，并互相合作，那么美国的援助将更有效，欧洲恢复的力量更持久。杜鲁门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并以为这将在欧洲国家中激起新的希望和信心。

1947年5月8日，艾奇逊在克利夫兰讲话中露出了一点风声。6月5日，马歇尔在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时，作了美国针对欧洲危机的行动方针的讲演。他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他的主旨是：欧洲各国首先就一项合作计划达成协议，以便利用欧洲大陆上的全部生产资源，然后美国尽力给予物质上的支援，使这个计划获得成功。

这个计划本来包括整个欧洲国家，但苏联和东欧国家严辞拒绝了。1948年4月，杜鲁门

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案”，并在三天后任命了经济合作总署的署长。

“马歇尔计划”提出后的四年内，美国向欧洲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贷款，对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经济的复兴、社会的稳定起了保障作用。同时，资产阶级政府也因此得以巩固，希腊、土耳其的共产党游击队失败了，法国、意大利的左翼势力也大大削弱。

杜鲁门曾得意洋洋地说：“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西欧很难避免共产主义的专制统治。”

美国的一系列行动激怒了苏联，它决定进行报复。在柏林，尽管四国分区占领，但英、法、美的军队必须通过一条被苏联控制的走廊地带，才能进入自己的占领区。1948年4月1日，苏联切断了来往柏林的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封锁了这条走廊，主要目的是将英、法、美赶出柏林。

杜鲁门行动迟缓，于6月末才作出决定，采取临时的“空运”措施，命令在欧洲所能动员的一切飞机参加向柏林空投粮食的任务。同时，他紧急致电斯大林，要求撤销封锁。但苏联以“技术困难”为理由，继续封锁。于是，杜鲁门开始了“空运战”。到7月，参加空运的

飞机达到100多架，其中有52架C—54型飞机和80架C—47型飞机，每天运入粮食3500吨。

到8月中旬，每天平均已达4500吨。一次一次的空运战使杜鲁门的外交努力黯然失色，一次次谈判都以失败告终。

1948年11月，柏林市政委员会分裂，这样柏林市实际上分裂成两个部分，这引起了杜鲁门的恐慌。他立刻建立安理会设立一个技术委员

会来解决封锁问题。到1949年初，苏联的封锁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西方的空运坚定了柏林人的信念。1月，斯大林暗示可以撤销封锁，杜鲁门立即给予响应。5月4日，四国发表公报，宣布英、法、苏同意从5月12日起结束柏林封锁。

柏林封锁——即第一次“柏林危机”，使西方看到了苏联的强大力量，是“冷战”的最初交锋。“杜鲁门主义”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经济复苏，也带来了“和平的恐怖”。德国的苏占区后来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其他部分合并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因此走向分裂。

第八章 再次竞选——举步维艰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一届任期四年，每第四年的1月20日是新总统上任的日子。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四个任期是从1945年1月开始的，这一任总统到1949年1月将御任。因此，在1948年，虽然离任期满还有一年，杜鲁门已经必须考虑是否再谋求总统职位的事了。在杜鲁门作总统的三年多时间里，结束二战的一系列活动给他带来了至尚的荣誉，对欧洲

大规模的援助使他成为“自由民主”社会的领袖，但对国内经济局势的软弱无力使他在美国人心目中名落千丈，支持率大大降低。三年的总统生涯的结果，喜忧参半。而他试图再次竞选的路上也荆棘密布，陷井重重。

这时的杜鲁门是什么想法呢？首先，他决定参加下一届的总统选举。他曾说：“就我个人而言，像在1944年一样，我不想仅仅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参加一次全国性政治运动。”那么，他为了什么呢？“1948年我决定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动机是同我在1949年的动机一样，在美国历史上民主党已执政1

6年了，政绩卓著，但仍然有许多工作有待于完成。”他以为，“自1932年以来经过艰苦奋斗的一些改革使美国各阶层有更多的人改善了生活，这些改革在40年代正在巩固下来。这些成就很容易遭受到反动派政治上的攻击，如果不由一个富于警惕性的民主党政府加以保障，这些成就就有可能丧失掉。”

杜鲁门的竞选理由是冠冕堂皇的，除了以上保卫国内改革措施外，他宣称，在国外“世界正处于大变动之中，革命在大多数‘无所有’的国家中蔓延开来，共产主义正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我们必须重新武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国”。而在国内，许多“好心肠的集团”“不惜任何代价”为和平而竞选，与此同时则为俄国人的“侵略行为”辩解。杜鲁门自豪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政策才能防止“自由国家的陷落”和完成对苏联的遏制。

当然，杜鲁门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困难。在美国的这场传统的“驴象之争”中，共和党是制约他的最强有力的力量。在1946年到1948年间，共和党在第80届国会中占多数，它所操纵的议会已经给杜鲁门出了一系列难题，而这些问题直接破坏了这位衣着讲究的总统在美国民众中的“光辉形象”，人们不会去怪他们的国会，而只会把怨言全部倾泻在这位矮胖的总统头上。杜鲁门对此一直愤愤不平，却也无计

可施。

就在杜鲁门痛下决心的时候，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进步党人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为和

平而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向苏联让步的理论，这对受战乱迫害、爱好和平的美国群众来说，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同时，传统的共和党的孤立主义思潮又有回头，反对对欧洲的援助，收缩干涉范围，保卫自己，这些观念在老一代中很有市场。还有一派势力，是南方民主党人和北方共和党人的联盟，他们顽固反对罗斯福的“新政”措施和杜鲁门的“二十一点”国情咨文，对政府干预经济积怨颇深，主张回复到自由竞争的放任状态，一些中小企业的投机者对此很感兴趣。

杜鲁门面前的另一些障碍是：(一)执政长达16年的民主党在人民心中引起的厌倦心理，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问题，(二)几乎90%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对杜鲁门采取攻击态度，这当然是因为这些报刊和广播已被共和党利用权势和金钱给收买了。在美国，这种利用报刊、电台进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宣传是屡见不鲜的，许多候选人就是因为一件丑闻被传扬出去而身败名裂，饮恨竞技场。杜鲁门的威信由此受到沉重打击，据1948年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他的支持率只有32%，而他刚登上总统位置时的支持率是70

%，真是一落千丈！

杜鲁门在民主党内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怀疑，担心他将失去总统宝座。按美国竞选的惯例，

宣布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必须先在其党内获得提名，才有资格参加全国竞选。美国民主党决定候选人提名的大会将在7月12日召开，杜鲁门抓紧从3月7日这段宝贵时间，开始了他参加竞选的决定性一步——游说全国。

杜鲁门不愧是久在政坛的资深政治家，他没有因为降低的支持率而气馁。他深信，老百

姓们受了共和党和恶意报刊的欺骗，他们不了解真相，所以把票投给了别人。他认为，现在最需要作的，就是把“真相”告诉人民。而为了这个目的，杜鲁门决定旅行到全国各地，以总统身份直接向人民讲话。这意味着他将坐火车行几千英里，随时随地停下来向集聚起的群众讲话。在美国历史上有两个总统曾有过这种计划，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他的旅行始终被政敌的抨击和反对分子的捣乱所困扰，以沮丧和失败而告终；另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他的身体在旅行中被拖垮了，命丧归途。有鉴于此，包括杜鲁门家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劝他不要冒险行事，杜鲁门都婉言谢绝了，1948年6月初，他开始了西行的征途。

从华盛顿到西海岸，又从西海岸返回华盛顿，杜

鲁门几乎横跨了北美大陆。在沿途的城市村镇和乡村，他作了76次即席演说，每到一地，他阐明自己的想法，揭露国会对他的攻击，他的言辞激烈，极富煽动性。他充满信心，使听众们也受到新的鼓舞。杜鲁门采用的是即兴演说法，最多只列一个提纲，这种方式任意性很大，非常容易抓住观众的心理，效果明显。在结束旅途时，他在华盛顿青年民主党人的一次集会发表讲话，这种不用讲稿的演讲方式再一次引起轰动，纽约一家报纸评论：“杜鲁门在以新的姿态发表战斗性演说。”

长途游说给杜鲁门的竞选带来了新的希望，坚定了他参加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的决心，然

而，事情远不如人意，民主党内部分裂的危险给他的竞选蒙上一层阴影。这种分裂势力主要来自南卡罗莱那、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

众所周知，美国南北战争便是因废除黑奴制而引起的，南方是坚决要维护黑人奴隶制的，

虽然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但南方的歧视黑人现象仍很严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气候条件适宜，几乎所有训练军队的兵营都设在南方，所以黑人和白人平等一体的想法遭到强烈的反抗。在雇佣建筑工人为政府修建兵营方面原是没有种族歧视的，而南方人对在建筑工人中实行的“黑白一体”政策特

别恼火；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政府关于就业平等的命令很不高兴，因为有色人种会占有白人的工作机会。

杜鲁门早就察觉了这种危险，但他不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那样他会受到更多人的反对。他呼吁全国行政人员和私人公司的职工在使用交通工具方面废除隔离和歧视，并把它列入1948年民主党纲领。这是冒党内分裂危险而作出的重大决定，而事实上，它只是为了表示他自己尊重人民公平权利的姿态，美国的种族歧视至今未有改善。

除了南方民主党人的反叛，华莱士的进步党人的威胁，杜鲁门的最大敌人是功勋卓著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因二战时的战绩显赫而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如果他想参加总统竞选，杜鲁门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他将面临民主党真正的“四分五裂”。作为民主党的主席，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还缺乏政治家的经验，目前参加选举为时过早。果然，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要他参加角逐的呼声，他告诉杜鲁门：“军人服从文官是必要的、明智的，当终生的职业军人不谋求高官显贵的时候，这一原则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

1948年7月12日，美国民主党全国政治会议在费拉德尔非亚召开。在大会上，将选出大会职员，然后任命一些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常设机构，接着就展

开工作，允许发表演说，对各自的候选人作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下一步是通过民主党纲领，代表们可以随时提出质问。在这些程序完成后，便要进行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提名往往伴之以非常热闹的场面。总统候选人提名结束后，副总统候选人同样要接受提名，之后，大会休会，这个党便出去进行竞选了。

杜鲁门在华盛顿通过电视看到了大会开幕的盛况。据安排，对杜鲁门的提名将由密苏里州州长唐纳利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杜鲁门计划7月14日出席大会，接受这次提名。

在副总统人选问题上，杜鲁门进行了审慎的考虑。根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腊的建议，副总统候选人可以是现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威廉·道格拉斯。于是，杜鲁门马上打电话给道格拉斯，希望他能作自己候选人名单中的副总统。第二天，道格拉斯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休假地打来电话，他很遗憾地告诉杜鲁门他不想进入政界。于是，杜鲁门实际上失去了这位理想的副总统。就在杜鲁门失望地无所适从的时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参议员巴克莱打来电话，自荐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问杜鲁门能否接受，杜鲁门当即回复：完全同意对他的提名。在杜鲁门眼中，巴克莱是参议院中最能干的辩论家，他是一个勤奋、诚实的政治家，是民主党中最孚众望的人之一，杜鲁

门把他称作“一位理想的伙伴”。

7月14日，就在杜鲁门到达费城时，大会正在进行最后的激烈辩论，投票没有开始。午夜过后，投票开始。第一次唱票，杜鲁门以947张半选票被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另外两个民主党人获得了其余的263张半选票。接着，大会以鼓掌的方式通过对艾尔本·巴莱克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杜鲁门在竞选路上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民主党的分裂程度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7月15日清晨二点，杜鲁门在获得提名后立即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表示正式接受提名。杜鲁门使用了他的拿手好戏——即席演说，一开始他就宣称：“参议员巴克莱和我一定会赢得这次选举的胜利，使这些共和党人乖乖地认输，你们可不要忘了这一点。”接着，他作了一次措词强硬和具有挑战性的演说。首先，他历数了历届民主党政府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前任总统罗斯福给广大劳工带来的福利；然后，他痛斥第80届国会的掣肘行为，特别是共和党控制下的种种失败。

在演说将结束时，杜鲁门打出了他的王牌，他宣布，7月26日，也就是密苏里州称之为“芜菁节”的那天，他将把国会议员召集起来，召开一次国会特别会议，讨论诸如制止物价上涨、应付房屋危机、对

教育增加经费、制订公民权利法、增加福利等敏感问题。杜鲁门高喊“民主党要迎接共和党的挑战，要尽一切力量同共和党搏斗”。杜鲁门的用意很明显，因为他提交的议案都是有利于人民的，所以美国群众会因此对他产生好感，在竞选中支持他。同时，以共和党为主的国会如果反对这些议案——显然他们一定会反对的——那么，人民就会痛恨共和党，共和党在大选中将处于不利之境地。杜鲁门又一次显示了一个政客的政治手段，他向共和党宣战了。

杜鲁门的演说博得了民主党代表的一致欢呼，然而，杜鲁门的竞选仍旧“路漫漫，其休远兮”。

1948年9月6日是美国法定的“劳工日”，参加这次总统选举的大多数人都将在这天正式宣布参加战斗，其中有：民主党的哈里·杜鲁门，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进步党的亨利·华莱士和州民主党的斯特罗姆·瑟蒙德。后两者都是从民主党中分裂出动的，很明显，他们将搞掉民主党的一部分选票，削弱对杜鲁门的支持。然而，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杜威，他本人不仅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有强大的共和党的鼎力支持。杜鲁门面临着内外夹攻的局势。

杜鲁门的第一步棋在9月6日前奏效了。他召集的特别国会在共和党的把持下未有任何结果。批判的靶子被杜鲁门竖立起来了，他决定以此为契基向共和

党开刀。

9月6日，杜鲁门在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的凯迪拉克广场发表了演说，为以后各次的竞选演说定下了基调。首先，他提醒劳工们注意，“在这次选举中，如果你们获得一个对劳工不友好的政府和国会，那就够你们担心害怕的了”，接着，他痛斥国会对劳工法案的态度，“如果让那班制定出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国会人士继续当权，如果让这些家伙由于选出一个共和党总统而进一步得到鼓励，你们劳工界人士便将遭到一连串切肤之痛的打击”。他公开攻击托马斯·杜威，“必须记住，今天的这个反动家伙是一个狡猾的人物，他是一个心计多端的人物”，与之相对照，他宣称，“在战争期间，当我作为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就美国工业进一步调查时，我了解到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了解并尊重工人和工会领袖们的想法和精神……”杜鲁门把自己宣传为劳工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并在最后高呼：“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争取权利的圣战的胜利！”

9月17日，杜鲁门走出了致胜的第二步棋——再一次游说全国。这次旅程是在逐州进行的，总旅程大约311万多英里，杜鲁门共发表了356篇演说，也就是说，在35天的旅行中，每天作10次讲演，可谓“用心良苦”。

在旅行的准备过程中，杜鲁门就对随行人员说，这次出行的目的就是要赢得选举胜利，他对巴克莱洋洋得意地讲：“我要把他们(指共和党和其他候选人)打得一败涂地。”然而，外界评论对他的希望不大，普遍的观点是：这是一场“单人马戏”，他的单枪匹马将一事无成。但是，出乎众人的预料之外，人们似乎对这位“粗鲁”的总统很感兴趣，他每次讲演都吸引了大批听讲者，人们从附近各地围到他的火车旁，听他宣扬自己的纲领。

在俄亥俄州，从辛辛那提到克里夫兰，一连串的小城市挤在一起，但每到一地，杜鲁门同样会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哥伦布城，群众是那么拥挤，以至于他根本无法走下火车。从阿尔巴尼到布法罗，虽然大雨倾盆，仍有许多群众汇聚在一起听杜鲁门那富有煽动性的表演。在萨克里门托小站，有一万人提前两个小时都守候在那里，等待总统的光临；在洛杉矶这个西海岸大城市，有100万人挤在大街上听了杜鲁门的演说。如此情形，不胜枚举。究其原因，除了杜鲁门个人魅力原因以外，他的总统身份和二战领袖的荣誉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同时，共和党候选人杜威也进行了遍及全国的演说活动，可他的吸引力与杜鲁门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唯一对他有利的是舆论界的倾向。一些主要的民

意测验机构都预言杜威将取得胜利，只有农业部一位经济学家路易斯·比恩和其他少数几个人估计民主党有获胜机会。

杜鲁门在竞选演讲中，一再称自己代表广大劳工的利益，而自己的竞选斗争就是劳工们

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同时，他尽量避免涉及外交政策的问题，因为这正是他颇受微词的地

方。在共和党的宣传中，猛烈攻击杜鲁门向欧洲等国提供巨额援助的作法，认为它损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在进步党的攻势中，杜鲁门又成了一个“战争贩子”，他在二战之后与苏联搞对立，势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另外，杜鲁门对阿拉伯国家问题、犹太复国运动等众多外交事务的政策也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平息国内的这种怨气，杜鲁门不得不向苏联表示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在10月初派遣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试图缓和两国的紧张气氛。

杜鲁门“单枪匹马”的行动似乎收到了一定效果，随着投票日期的临近，人们对他的反应越来越积极了。尽管民意测验机构和新闻媒介仍大力吹捧托马斯·杜威，杜鲁门仍坚信自己会取得胜利。1948年10月31日，经过了他一生中 longest、最艰苦的一次政治运动之后，杜鲁门回到了密苏里州的独立城，静候11

月2日的大选投票日。11月1日，杜鲁门在卧室中通过四大广播公司向大约7000万美国公众发表了演说，这是他为争取连任总统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鹿死谁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11月2日下午，杜鲁门躲进了离堪萨斯城约30英里的埃耳姆斯旅馆，静观大选进程。

午夜时分，新闻报告说杜鲁门在东部各州中票数领先，但舆论界仍不认为他会当选。又一次大大地出乎人们的预料，杜鲁门最终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最后数字表明：杜鲁门共获得24184836票，在28个州获胜，杜威获21969000张选票，在16个州中领先，华莱士和瑟蒙德各得100万票多一点。杜鲁门在南部四个州中败于南方民主党之手，但在全国最大的13个城市和全国最大的7个农业州中都获得了胜利。

1948年的大选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杜鲁门在新闻评估、民意测验极端不利的困境里冲出重围，问鼎总统宝座，为人们所始料不及。究其原因，他继承罗斯福“新政”传统，推进社会福利政策，赢得了广大普通群众的好感，而在对德、对日作战和战后的外交处理上，杜鲁门维护了美国作为全球领袖的形象，这也是为美国人所称道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竞选中不遗余力地深入全国各地，

开展广泛的游说活动，又打动了一些人的心，这种作法自他开始，为历届总统选举中的候选人所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杜鲁门的胜利是以微弱多数为保证的，可见，有很多的人对他心存不满。然而，他毕竟是胜利了。而且更使他振奋的是，民主党重新获得了原来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大多数议席，还取得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正式就任他的第二届总统职位。宣誓仪式在正午进行，首先由

最高法院副院长斯坦莱·里德主持巴克莱的副总统宣誓仪式。六分钟后，由最高法院院长文森主持杜鲁门任总统的仪式，他宣读了同三年零九个月前一样的总统誓词，然后开始就职演说。

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宣称，“对我们和全世界来说，今天标志着一个多事的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的开始。”他公开指出，共产主义正在破坏美国的“民主主义”，为了遏制它的扩张，美国必须在联合国中与苏联斗争，必须执行欧洲复兴计划。杜鲁门将以上概括为三点原则：（一）继续支持联合国的行动和有关机构；（二）继续执行世界经济复苏计划；（三）加强爱好自由国家的力量以防御侵略的威胁。

杜鲁门着重谈了他的第四条原则，“我认为，我们应该使我们丰富的技术知识为爱好和平的人民造福，

帮助他们实现改善生活的愿望，并与其他各国合作，我们应该鼓励对需要开发的地区投资。”他还提出了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的狂想，“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产生动力……我相信今天还反对我们的那些国家会抛弃他们的妄想，参加到自由世界国家的行列中来。”

中午12点50分，总统就职典礼结束，杜鲁门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冒险。

刚刚上任的杜鲁门根据他在就职演说中的第四条原则制定了“第四点计划”，名义上是利

用美国经过试验和得到证明的技术知识帮助落后国家自立，实际上是在和苏联争夺控制范围。他大规模地援助希腊、土耳其，希腊的游击战争因此而失败了。1950年6月，“第四点计划”列为对外援助法案中的“国际开发法案”，用于该项援助的款项达3450万美元。美国列出的对外援助名单遍及亚、非、拉各洲，在真正的经济援助的同时，美国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并操纵政治活动，牢牢地掌握了对它们的支配权。

杜鲁门第二次就任后，以苏联东欧为最大的假想敌，开始了联合西欧、布置对苏联和中

国的包围圈、控制广大新兴独立国家等一系列计划，美苏“冷战”的热度在他手中被一点点升高，甚

至导致了局部的“热战”。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杜鲁门在第二次竞选中表现出的坚定的个人意志、雄辩的口才和政治家的远见。杜鲁门虽如履薄冰，但还是缓了一口气

第九章 朝鲜战争——“君臣之争”

杜鲁门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分子，这注定了他的第二任期中要与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发生各种冲突的命运。

继“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和“希一士”援助计划之后，杜鲁门为“冷战”作的又一“贡献”是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早在1948年3月，杜鲁门在纽约的一个圣帕特里克庆祝仪式上就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说，他希望在这种形势之下西欧能够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自由”。与此同时，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为加强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御侵略，正在布鲁塞尔开会，并签订了一个为期50年的合作协议。4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会见杜鲁门总统，认为：如果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来，那么苏联人很可能会重新估计形势，变得合作一些。他同时说明，如果没有美国的参加，这个集体安全体系将没有保障，暗示出要求美国参加的意图。

适应于美国加入这个条件，杜鲁门一手炮制了范登堡决议案，并命令国务院立即着手与布鲁塞尔条约国家进行初步会谈。经过一系列妥协与让步，杜鲁门

在1949年4月4日在“北大西洋公约”上签字。在签字仪式的讲话中，杜鲁门希望12个国家能够团结一致，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7月25日，杜鲁门在国会投票赞同美国加入条约之后，签署了公约批准书。8月2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为事实。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是战后美国集团安全理论的实践，它不仅是一个政治联盟，也是一个军事同盟。当苏联为了对抗它而建立“华沙条约组织”后，“冷战”的两大对立集体就正式建立了，它们的对抗持续到90年代才告一段落。

“北约”是杜鲁门在欧洲拼凑起来的对抗苏联东欧的军事集团；在亚洲，他所关注的就是

东亚地区——中国、朝鲜和日本。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驻日美军实际担负着美国控制本地区的

任务，同时密切注意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动向。

朝鲜，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源远流长，自汉代开始便有交往，此后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便是因日本占领朝鲜而起，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朝鲜人民沦为猪狗不如的殖民地居民。在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革命者们壮大起来，在

中国东北和中朝边境坚持抗战，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最终取得胜利。胜利后的金日成在苏占区站稳了脚。

朝鲜在美国的战略计划中本来并不重要，杜鲁门也对它不屑一顾。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决议中决定“使朝鲜自由独立”，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由中、苏、美三国托管朝鲜。实际上，杜鲁门对抗战胜利后美苏以“三人线”分治朝鲜也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的目光焦点是在日本岛，而不是在朝鲜半岛。曾有人建议由美军接管整个朝鲜半岛，但杜鲁门认为那样会延缓美军在日本的登陆。

美苏“三八线”分治后，实际上出现了南北分裂的趋势。北部朝鲜有日本遗留的大量工业基础设施，而南部朝鲜则有肥沃的土地，朝鲜人民渴望统一，重新振兴祖国。无论是在苏占区，还是在美占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外国军队占领，要求独立。有鉴于此，驻朝美军司令霍季将军认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取消三八线这个障碍以统一朝鲜”。1946年1月美苏举行会谈，双方都无意让步，不欢而散。

杜鲁门根据报告，对朝鲜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新的转变，他宣称：“这个地方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斗争。”他把朝鲜问题夸大成“共产主义”与“民主制度”之

战，美国逐渐重视起地图上这块小小的半岛了。

1946年秋，北部占领区人民举行了当地“人民委员会”的选举，有99.13%的人参加了投票，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一枝独秀，实际掌握了政权。杜鲁门闻讯非常恐慌，他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将领们普遍认为美国以人员不足的部队占领朝鲜，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美国可能在亚洲大陆进行的任何进攻，多半会绕过朝鲜半岛。根据这样一种战略考虑，美方同意苏联的建议，在1948年初美苏两军同时撤离朝鲜，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双方同时举行选举，以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美国占领区的选举在1948年5月10日举行，国民议会在5月31日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李承晚被选为主席。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李承晚任总统，美国

军政府宣告结束。针对南朝鲜自立国家的行动，9月9日，北朝鲜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军在年底全部撤离。这样，朝鲜半岛无外国驻军，南北政府开始了较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蒋介石仓皇

逃往台湾，这不仅是他的失败，也是美国在亚洲的重大失败。杜鲁门在当时既不满蒋介石的无能，又仇视中国共产党政府，因此，他对蒋介石政府一方面

不予援助，另一方面又在国际上承认其合法地位。同时，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也突出起来，一旦占有它，进军中国的陆上门户便打开了。杜鲁门又把目光转向了这座半岛，命令魏德迈将军帮助南朝鲜建立和训练它本国的国防军，以对抗北朝鲜，威胁中国大陆。

1950年的北纬38度线上，火药味十足，南北朝鲜的军队不断互相发生冲突，杜鲁门感到战争迫在眉睫了。果然，1950年6月24日，当他正在家乡独立城度周末的时候，国务卿在晚10点多打来电话，紧急报告：朝鲜战争爆发了。杜鲁门第二天便从堪萨斯城飞回华盛顿。

在国防部的会议上，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报告说，联合国安理会以9对0的票数，一致宣布北朝鲜行动破坏了和平，要求他们撤回自己的部队。杜鲁门在讨论后发布命令：命令麦克

阿瑟将军撤走一切在南朝鲜的美国人员；空投军火和给养给李承晚部队；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同时，他指示三军参谋长作好准备，一旦联合国“号召”向北朝鲜采取行动，美军要首当其冲，这时的杜鲁门已预谋侵略朝鲜了。

朝鲜战局的发展快得令杜鲁门吃惊，南朝鲜军队不堪一击，迅速败退，金日城的人民军已接近南朝鲜首都汉城市，杜鲁门确信：韩国需要立即援助！他命令

麦克阿瑟指挥他手下的空军和海军去支援韩国，但只限于“三八线”以南地区；又命令第七舰队迅速在台湾海峡布署，防止中国共产党军队解放台湾；他还向联合国紧急呼吁，要求援助南朝鲜。

杜鲁门曾与助手们探讨过美军打过“三八线”的可能；但他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就在这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传来消息，他愿意出兵，在美国的帮助下击退北朝鲜。这显然是蒋介石又作起了“光复大陆”的美梦，杜鲁门害怕蒋介石的行动会激怒毛泽东，就严辞拒绝了。他命令麦克阿瑟使用一个团的兵力先行支援南朝鲜。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美国的出兵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7月初，他同英国首相艾德礼举行会谈，大力鼓吹反击共产主义的进攻，要求出兵朝鲜。艾德礼唯唯喏喏，附和他的观点。7月7日，安理会不顾苏联代表的缺席通过了议案，授权组织联合国部队去“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杜鲁门同时提请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同日，麦克阿瑟提出他的反攻的基本计划：尽量利用对海空方面的控制；采用水陆并进的办法，打击敌人密集的地面部队的后方。其首要的行动就是从仁川和釜山登陆，向北进攻。7月19日，杜鲁门请求国会取消对武装部队数量的限制，增加国防费用。7月31日，他批准征调国民军上两个师参加联邦军队在朝鲜作

战。

7月27日，杜鲁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阐述了对华政策：给予国民党中国以广泛的军事

援助；由麦克阿瑟总部对蒋介石军队的需要作军事方面的调查；计划在中国海岸作侦察飞行，以确定对台湾的攻击的紧迫性。杜鲁门不希望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也不想把它引到朝鲜战争的轨道上来。麦克阿瑟也来电表示不要因为台湾和大陆关系问题使战局复杂化。8月14日，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在台湾的美军行动只限于辅助行动，不在该岛使用武装部队，重要行动要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

8月26日，风云突变，麦克阿瑟在一份声明中公开叫嚣要“保卫台湾”，以台湾为推行军事侵略政策的据点。与此同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谴责美国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杜鲁门恼羞成怒，考虑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远东战区指挥官职务，不再让他管台湾和朝鲜的事。然而，这位将军的名声如此之大，杜鲁门唯恐他会影响自己的形象，只好忍气吞声。在和艾奇逊等人讨论后，他回电麦克阿瑟，希望他收回关于台湾的声明。

尽管在台湾问题上有分歧，杜鲁门仍旧全力支持麦克阿瑟在朝鲜的登陆计划。他从美国大陆、波多黎各、夏威夷等地抽调兵力支援朝鲜美军。9月1日，

杜鲁门发表广播讲话,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辩解和鼓吹,他将美国的战略意图归结为八点,每一点都粉饰以“正义”的外衣。就在美军正式作战前,杜鲁门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授权麦克阿瑟将军采取“必要军事行动”,把北朝鲜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或苏联军队没有支援北朝鲜,他可以率军占领北朝鲜。

1950年9月15日,美陆军第七步兵师和第一陆战师在仁川登陆,9月26日,第八军在釜山登陆成功,与第七步兵师会师。9月28日,美军又占领汉城。杜鲁门致电表示祝贺。美军依靠先进的机械化部队和充足的后备给养,迅速全线推进,至10月2日,已打过三八线,向北朝鲜腹地推进,金日成政府已作好向中国东北地区撤退的准备。

正当杜鲁门自鸣得意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10月3日,杜鲁门接到了印度驻中国大使的消息,周恩来总理警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政府将派军援助金日成。杜鲁门急忙又电令麦克阿瑟:美国部队不准越过朝鲜和中国的边界或朝苏边界;非朝鲜部队一概不准在和苏联接壤的地区或和中国接壤的地区使用,严禁对中国或苏联使用空军和海军。

中国有句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麦

克阿瑟将军身在远东，也颇有不受杜鲁门总统之命的意味。为了笼络住这位桀傲不驯的指挥官，杜鲁门亲劳大驾，于10月11日前往太平洋中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进行会面。

10月15日，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进行单独会议。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战争的战局美国赢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会进攻；他还对自己过去对台湾问题的声明表示抱歉。杜鲁门向他通报了欧洲局势，并表达了对他的信任。麦克阿瑟口出狂言：在感恩节前，战争就会结束，他将把第八军撤回日本，第二年1月，美军将全部撤出朝鲜半岛。

10月16日，杜鲁门乘机返回美国，在旧金山歌剧院发表了演说。他称赞麦克阿瑟是“一

个非常伟大的战士”，并相信“联合国军”一定会很快恢复朝鲜的和平。他同时指责苏联，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正义行为。在这次演说中，杜鲁门充分暴露了美国妄图控制朝鲜、日本，威胁中国、苏联的野心。

10月份的最初战局对美国人似乎很有利，杜鲁门高兴地知道他的军队在10日占领了平壤，

而且已有42个国家派兵参与“联合国军”行动，然而，好景不长。10月31日，他收到确切消息，证明中国共产党已派兵在朝鲜作战。实际上，他得到

的消息已晚了许多。以彭德怀元帅为总司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0月19日就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从10月25日开始，发动了第一次战役，迫使美军撤回清川江以南。

妄自尊大的麦克阿瑟在11月4日仍不相信志愿军已开始作战，他给杜鲁门的电报中仍怀疑中国共产党支援朝鲜的真实性。而正在忙于大选的杜鲁门的头脑还算清醒，密切注意北京的动向。11月6日，他接到艾奇逊的电话，说麦克阿瑟要求空军轰炸在鸭绿江上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大桥。杜鲁门顿时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立即指示：电告麦克阿瑟，政府正在对朝鲜局势作紧急考虑，所有离中国东北五英里以内的目标，都要暂缓轰炸。然而，麦克阿瑟立刻发电反驳，认为炸桥是截断“敌军”补给线的唯一办法。杜鲁门只得同意轰炸，但命令不要轰炸中国的水坝和发电厂。

随着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的第二次攻势的节节胜利，杜鲁门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政府真的参战了。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叫得很凶，但他并不敢真的与中国大陆发生战争。他认为，那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无论是美国人民还是西方盟友，都反对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他们已被战争给拖垮了，成了惊弓之鸟。因此，杜鲁门不敢冒天下之

大不韪，尽量避免直接针对北京的军事行动，“明哲保身”罢了。与杜鲁门相反，麦克阿瑟到处扬言，如果美国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朝鲜问题便早就解决了。他又在11月底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攻势，更使杜鲁门气恼。而他重提国民党参战的旧事，则为杜鲁门所不屑。

为了恐吓中国政府，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发表了一份态度强硬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这本来是他用来威胁中苏两国的，却引起了他的盟国的不安。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来到华盛顿，商谈朝鲜半岛局势。

在杜鲁门与艾德礼的会议中，杜鲁门透露出许多美国对朝鲜问题的真正看法。杜鲁门认

为，在朝鲜的战争表面上是南北朝鲜军队的对抗，实质上是美苏、美、中国家间的较量。北朝鲜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介入，在杜鲁门眼中都是受了苏联的唆使和怂恿。因此，

美国决不能跟中国或苏联交战，那样会正中“敌人”的下怀。谈到蒋介石，杜鲁门对之嗤之以鼻，他不认为蒋介石集团在台湾能有什么作为，但为了构成对大陆的威胁，美国还是要阻止台湾的“沦陷”，把它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艾德礼提出了中国与苏联区别对待的观点。他认

为，中国与苏联(前身是沙俄)自古以来就是劲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会受苏联控制的，势必走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他提出，如果让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就可以用宪章约束它，而它游离于联合国之外则是一个危险。杜鲁门不以为然，他担心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会加强苏联的势力，而且有台湾问题在，新中国政府也不会与美英合作。最令英国首相担心的是原子弹的问题，杜鲁门保证美国并没真的打算使用它。双方最后发布一个公告，会谈便结束了。

1950年12月，杜鲁门听到了很糟糕的消息，“联合国军”已被迫大规模撤退。很明显，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火力把美国人打垮了。同时，麦克阿瑟开始考虑对新中国的行动，他计划：由联合国封锁中国海岸，飞机轰炸大陆；在朝鲜利用国民党军队，还要通过香港把蒋介石军队引导到中国南方去。当杜鲁门得知这个秘密后，大吃一惊，他惊呼：“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险发动一次大战！我可不这样干！”

杜鲁门并不是真的“爱好和平”，就在亚洲十三国向联合国提出在朝鲜半岛停火的提案后，他公然表示：“我可不愿在条件没谈妥时就停止战斗！”1950年12月15日，他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将进入全国的紧急状态时期，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支持美国的“和平行动”。于是，这位“冷战”总统又把人民拖

进了“热战”。

对于杜鲁门来说，1951年的到来是灾难性的。麦克阿瑟要求增兵日本，杜鲁门却无一卒可派；麦克阿瑟一再提议袭击中国东北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台湾部队，杜鲁门置之不理；麦克阿瑟公开指责杜鲁门的“无意扩大战争”是在“逐渐缩小美军的阵地”，杜鲁门有口难辩。终于，1951年1月1日，中国军队占领汉城，重新将美军压缩到南部一隅。麦克阿瑟大发雷霆，他回电国务院，抱怨自己的权力受限，任务和权力不明确，“联合国”军已筋疲力尽，士气低落，后果严重。杜鲁门虽深感不满，但为了全局考虑，只得回电安抚他，并说明目前美军战略意图。

1951年1月开始，朝鲜半岛的对峙军队进入相持阶段，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矛盾也激化了。3月21日，杜鲁门发表声明。他首先指出，现在朝鲜的敌对双方已恢复到战前的占领地区，应该按联合国决议恢复该地区和平，组成统一的政府，接着，他宣称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将继续下去。不幸的是，这篇粉饰太平的声明枉费了杜鲁门的心机。3天后，麦克阿瑟发表声明，决心用武力击溃新中国政权。这等于向中国下了最后通牒，引起了国际上一阵恐慌，各国纷纷致电杜鲁门要求不要发动对华战争。

杜鲁门忍无可忍了，他认为这是一个职业军人对

他所效忠的政府的不忠，他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计划一次次地被破坏，他决心撤换麦克阿瑟。但是，对这样一个著名将领的处理不是轻而易举的，各界的压力纷至沓来。杜鲁门在公开的解释中这样说：“政策是由选出来的政治官员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将领们决定的。然而，麦克阿瑟将军却表示他不愿接受政府的政策，实际上他用他的政策反对总统的政策。”在与马歇尔将军、艾奇逊国务卿等磋商了多次后，杜鲁门在1951年4月9日起草命令，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各项统率权，并由驻朝第八军司令官李奇微中将接替他的职务。4月11日，杜鲁门召开特别记者执行会，正式宣布解职命令。

这样，在朝鲜战争中最著名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结束了，一位五星上将解甲归田，而杜鲁门再次维护了自己作为总统的尊严，但他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因为他对麦克阿瑟的解职，使他在公众中的支持率急剧下降。

从此，朝鲜战争打打停停，双方僵持不下。杜鲁门只好下令进行和平谈判，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就双方占领区问题、战后各方处理问题、选举问题、外国军队问题，特别是战俘遣返问题进行了“拉锯战”。这段时间的杜鲁门，既已经完成了总决策，又有了顺

从的将军，便不再显著地活跃在这个舞台上了。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一直拖到1953年7月，在《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杜鲁门已为一介平民了。无论如何，杜鲁门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战争中是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他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进程。众所周知：美国失败了，中国胜利了，朝鲜半岛陷入了持续到今天的分裂。

杜鲁门，被人们斥为“对美国第一次战败负责的人”，因为他的专横而被载入美国史册，而麦克阿瑟却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同情。

第十章 激流勇退——寻常百姓

杜鲁门发动的朝鲜战争，不仅把美国军队送上了战场，也把美国人民拖进了战争的深渊。

国内某些企业的生产甚至回到了二战时的状态，其中最重要的是钢铁企业，工人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都达到了超常的状态。

资本家们从战争中发了大财，而普通工人却仍收入微薄，这种状况引起了工人们极大不满。1951年，美国钢铁公司等几大公司的工会要求与资本家谈判，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公司当局严辞拒绝，工会宣布将举行大罢工。杜鲁门对局势的恶化深表不安，他不希望这支军工企业的最重要的力量陷入瘫痪。他责成工资稳定局进行广泛的听证会，促使劳资双方妥协。3月，工资稳定局提出了一份增加工人工资的计划，但钢铁公司立即加以回绝。劳资双方重又僵持不下。

杜鲁门正无计可施，他的部长们又火上浇油，他们报告：如果钢铁企业停产，则军事装

备、原子能建设、动力工厂、铁路、造船等等都将受毁灭性打击。在无可奈何之下，杜鲁门施出了

“杀手锏”——政府接管钢铁企业。这句话说来容易，实则深深触动美国固有的思想积淀。在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国家管得越少越好，因此由国家经营钢铁企业是不可想象的。

杜鲁门态度是坚决的，他命令商务部长接管钢铁企业生产，同时继续与劳资双方谈判。钢铁公司发动了猛烈的反击行动，他们上诉最高法院，控告总统越权。尽管杜鲁门多次发表演说为自己辩白，然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仍令他大失所望：总统接管钢铁企业的命令违反了他所被授予的权力规定。1952年6月2日，杜鲁门只好认输，命令商务部长索耶把钢铁企业归还给资本家们。几天后，他被迫同意钢铁企业的提价要求，以换取他们对提高工人工资的同意，平息已长达7个星期的60万工人的罢工。

接管钢铁企业未果，这是杜鲁门在第二任总统位置上的又一大失败。

1952年，又是美国的一个大选年，已连任两届总统的杜鲁门何去何从呢？这年3月29日，在华盛顿首都国家警卫队军械库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午宴会上，杜鲁门向5300多名民主党党员正式宣布，他将不再参加总统竞选。

是所谓“鸟尽弓藏”吗？当然不，杜鲁门并不是因为无事可作而不想再当总统，实为形势所迫，自觉无

能为力了。且不论朝鲜战争中他所受的指责和钢铁危机中他的失败，就是在和国会斗争中他也屡屡受挫。

1952年国会通过法律，批准各州拥有石油开采权。杜鲁门立即行使总统否决权，坚决主张由联邦政府控制石油命脉。更使杜鲁门坐立不安的是，在50年代美国兴起了疯狂的“麦卡锡主义”。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疯狂反对共产主义，并在国内大搞恐怖言行，煽动人们揪出所谓国内的共产党人。一时间，从普通群众到政府官员，一大批人因背负了“共产党人”的罪名而被迫害，甚至致死，杜鲁门也反共，但不希望造成国内的混乱不堪，因此对“麦卡锡主义”持消极态度。但麦卡锡正利用了这点，大肆攻击杜鲁门和他的政府，甚至公开叫嚷杜鲁门支持共产党人。如此事件，数不胜数，杜鲁门已心灰意冷，无意再作总统。

杜鲁门不参加竞选也有内部原因，作了近8年的总统，他对权力的争夺厌倦了。他说：“权势有一种引诱力。它可以渗入人的血液，正像颇具诱惑力的赌博和贪财一样。”“我认为，当8年的总统就够了”1952年11月4日，杜鲁门在独立城参加了总统选举的投票，候选人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感到万分轻松。这次大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杜鲁门致电祝贺。

1953年1月19日，哈里·杜鲁门一家结束

了在那座象征最高权力和荣誉的白宫的生活，返回密苏里州的独立城。

哈里·S·杜鲁门的总统生涯结束了。

回到家乡的杜鲁门不再那么热衷于政治了。他的精力投在了“杜鲁门图书馆”的建设上同时撰写《杜鲁门回忆录》，这也许是美国总统卸职后的共同爱好吧。

杜鲁门不再是总统，他可以每天和家人们欢乐地呆在一起，而不必担心突然被国务打扰。他可以像常人一样在美丽古朴的街道上散步，和可爱的乡亲们闲谈取乐，而不担心于国际风云。在权力的角斗场上决逐了一番之后，他终于品出了“平平淡淡总是真”的道理。

1972年12月26日，哈里·S·杜鲁门安然逝去，享年88岁。

一代总统，曾经叱咤于国际风云之间，终不免陨落於苍莽；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